

中国观

2017年第9期 总第73期

CHINA WATCH

国际视角 前沿观点 World Insight



复旦发展研究院
FUD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
Centre for Think-tanks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in Shanghai

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

目录 | CONTENTS

域外谈一带一路

- 01 变化国际秩序下跨区域合作的新模式？“16+1 合作”与中非合作论坛的对比研究 /Viktor Eszterhai
- 05 尼泊尔抓住“一带一路”机遇 /Pramod Jaiswal
- 08 德国看“一带一路” /Viktor Eszterhai

中国经济去杠杆化

- 14 中国式高风险 /Evan A. Feigenbaum
- 20 中国银行业：无止境的猫鼠游戏造福大玩家 /Alicia García-Herrero
- 23 中国去杠杆化？前路漫漫 /Alicia García-Herrero

解读中印洞朗对峙

- 25 印度外交政策中的地缘经济目的及莫迪政府 /Rajesh Rajagopalan
- 27 印度战略选择：中国及亚洲力量均势 /Péter Klemensits
- 34 洞朗对峙事件的后续局势 /Christophe Jaffrelot

亚洲反恐

- 36 中国就恐怖主义向巴基斯坦施压？ /Arushi Kumar
- 38 阿富汗反恐的地区参与的前景 /S. Mahdi Munadi

编辑部

Editorial Department

责任编辑	Responsible Editor
张怡	Zhang Yi
沈国麟	Shen Guolin
黄昊	Huang Hao
执行编辑	Executive Editor
王柯力	Wang Keli
栏目编辑	Column Editor
付宇	Fu Yu
周光俊	Zhou Guangjun
刊物设计	Art Editor
范佳秋	Fan Jiaqiu

中国观

CHINA WATCH

主办 | 复旦发展研究院 FDDI

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

CENTREMS

地址 | 复旦大学智库楼 211 室

中国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

Room 211, Think Tank Building,

Fudan University

220, Handan Road, Shanghai, China

邮箱 | thinktank@fudan.edu.cn

电话 | 021-65645596

021-55665501

鸣谢 | 上海钰翔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变化国际秩序下跨区域合作的新模式？ “16+1 合作”与中非合作论坛的对比研究

Viktor Eszterhai

201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开启了中国外交史上的新篇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外交并不活跃，但是现在中国正越来越成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这并非一个新近现象，近十年来，中国致力于跨区域合作制度建设，已经体现出了这种态势。本文比较了中非合作论坛和“16+1 合作”（中国 - 中东欧合作）两种跨区域合作机制的特点，认为中国的跨区域合作制度建设有一套特定方式，未来这种模式可能可以推广至其他地区。

中非合作论坛和“16+1 合作”是一种新的机制吗？

初看起来，中非合作论坛和中国 - 中东欧国家的“16+1 合作”似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前者成立于 2000 年，后者成立于 2012 年，而且非洲和中东欧地区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状况。但是本文认为二者有着相当多的共同特点。此外，本文还认为，如果中国的国际制度建设能形成一套有普遍性的模式，也就是说，中国领导层应把它建设成一套机制，而不只是组织或机构，这套机制将对二战后形成的有着西方特点的组织机制体系形成挑战，与此同时现有体系也是美国霸权主导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支柱。因此，探讨国际机制建设意义深远。

中非合作论坛

中非合作论坛的建立是中非关系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它为中非合作提供了新的政治和制度框架。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首次召开峰会，确定中国与 44 个非洲国家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并决定每三年召开一次峰会（在中国和非洲国家轮流举行），巩固中非友好关系，进一步探讨合作可能。得益于中非合作论坛会议的召开和中国的大力投入，中国与非洲大陆的关系不断加深。2006 年提出的“八项措施”和 2009 年提出的“新八项措施”确定了合作的宗旨。通过一系列会议，中国针对非洲承诺提出拓展商业关系，提供优惠贷款，进一步开放中国免税市场，免除最贫困非洲国家的债务等优惠政策。此外，中国还按照国内经济特区的模式在非洲建立“经济合作区”，建立中非发展基金，并承诺与非洲分享科学技术（如农业和绿色能源领域）。中国还为非洲国家提供丰富的奖学金（如 2015 年的峰会上中国承诺提供 3 万个奖学金名额）和职业训练机会，在医疗卫生领域展开合作（建设医院、培养专家、协助对抗传染性疾病）。中国还意识到，对非盟提供经济支持也颇为重要（如为会议中心的建设提供资金、

为维和提供必要的援助)。

“16+1 合作”

2011 年，温家宝总理访问匈牙利，声明中国将致力于发展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并亟需建立一种新的机制。一年后，为了协调中国与 16 个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并将其以制度化的方式确定下来，中国与中东欧各国在华沙确立了“16+1 合作”的政治框架。各国通过制定“十二项措施”确定了合作的基本宗旨。并在此后每年举行一次国家领导人会晤。2013 年 11 月的布加勒斯特峰会上，合作秘书处成立，秘书处设在北京，负责机构的协调和运行，会议还同意在多个合作领域建立协调中心。在贝尔格莱德峰会上，“16+1”框架下的第一个协调部门成立，并确定了几个大型项目（如布达佩斯 - 贝尔格莱德铁路的修建）。2015 年 11 月的杭州峰会最终确定了合作运行秩序，并通过了“中期议程”文件。在 2016 年 11 月的里加峰会上，中国 - 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成立。

“16+1 合作”与非洲合作论坛的共同特点

如果研究“16+1 合作”和非洲合作论坛的共同特点，第一点就是二者都符合国际组织的标准并具有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

●二者都是通过主权国家之间的协议建立的（虽然在中非合作论坛上非盟也是代表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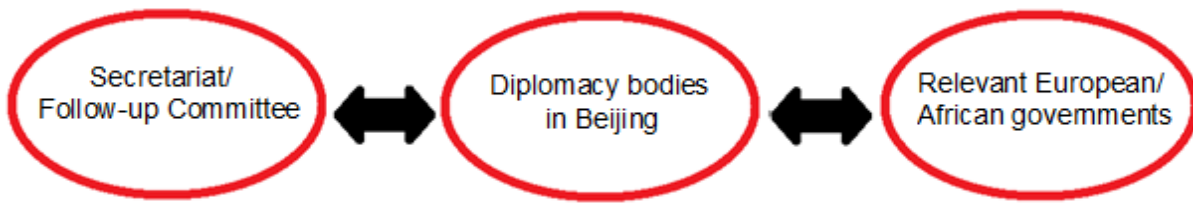
●二者都是基于成员国的共同利益，旨在提高沟通的有效性，并通过国家政策的协调达成更有效的合作。

●二者都建立了正式的机构（比如“16+1 合作”的秘书处，非洲合作论坛的后续行动委员会），并定期召开全体会议（中国 - 中东欧合作每年举行一次峰会，非洲合作论坛每三年举行一次峰会）。

●二者的合作都在不断发展：成立之后确立了运行的制度框架，然后逐渐充实内容。

因此，从实践上来看，二者其实都可以算作国际机构。然而如果进一步研究二者的共同特点，可以发现他们的国际机构属性并不明显。

第二，中非合作论坛与“16+1 合作”的合作机制都比较松散。尽管它们都有管理机构，但是它们的运行机制是非常规的、松散的。中非合作论坛和“16+1 合作”的运行机制都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领导人会晤；第二层是关键领域上的专家咨询与合作（如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领域）；第三层也是最重要的一层，是设有与各国驻华使馆保持长期联系的中央机构（监督成果落实、筹备会议召开、优化议题设置），中非合作论坛的中央机构是后续行动委员会，“16+1 合作”是秘书处。成员国本着自愿的原则参与这两个机构的工作。一般来说，松散的机制意味着松散的组织。但是对于这两个机构来说，这个特点非常重要，因为它允许成员国只在涉及



秘书处 / 后续行动委员会；驻华外交机构；所涉欧洲 / 非洲国家政府
中非合作论坛和“16+1 合作”的决策机制

到其关切利益时参与其中，大大增加了机构的可操作性。

第三，两者的成员国都有相当强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中东欧地区和非洲地区内部，以及中国与这两个地区之间。成员国有着相当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它们还是不同国际组织的成员。比如说，中东欧国家的语言分属不同语系；宗教信仰多元；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11个国家加入了欧盟，12个国家加入了北约。中东欧国家与中国也鲜有相似之处，唯一的共同点可能就是曾同属共产主义阵营，而且经济水平欠发达。中非合作论坛中的51个非洲国家也存在相似的问题：国家之间有着不同的历史、经济、种族、文化背景。类似地，非洲国家与中国的差异也很明显；不过很重要的一点是，非洲国家和中国都是发展中国家，而且都有被西方殖民的惨痛历史。一般来说，同质性是多边合作有效进行的重要前提。但是，这两个合作机制都没有刻意追求同质性。同质性的缺乏可能恰恰释放出能量，让成员国为合作投入更多精力。

第四，这两个多边机构在结构上都是不对称的：中国都扮演着推动者的角色。中国是两个机构的倡导者，也在上文提及的运行机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这两个平台并不专为中国利益服务。二者都充分关注了小国的利益，在筹备阶段，小国行动恰当的话，它们甚至可以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进一步来说，从长远来看，中东欧国家和非洲国家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减少各国有关承接中国投资的竞争，也可以团结起来影响中国的政策。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中国的实力比这两个区域的国家加起来还要强大，因此这种不对称的结构未来可能难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第五，这两个组织都很有规划性，这些规划为它们的发展定下了方向。在峰会上，各国基于中国的建议，共同确定中短期规划和实际目标（如“八项措施”、“十二项措施”），之后的会议则对其进行考察，适当加以补充。这种规划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机制的有效性和优化能力。

第六，“16+1 合作”和中非合作论坛的合作领域都相当广泛，涵盖了文化、科技、生态环境等领域，但是最重要的无疑还是经济。经济合作的主要项目有金融合作（优惠贷款和投资）和基础设施援助（比如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铁路、由中国-非盟共同投资的联通非洲主要城市的项目）。

经济合作方面的机构和论坛也是最活跃、最重要的，“16+1 合作”有“中国-中东欧国家联合商会”和“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中非合作论坛有“中非民间商会”和“中非商务会议”。两个组织对经济合作的关注使得整个机制非常注重效益。

第七，“16+1 合作”与中非合作论坛都是非意识形态的。但是这种务实的外交政策并不代表没有共同认可的原则。一带一路常提的基本价值观在这两个组织中也同样重要，比如，“和谐”与“包容”原则提倡不同政体的国家应和谐共处。还有一个常提的原则“互利”，则讲究合作双方都有所受益，不过这不是说双方一定会得到同样多的利益。

最后，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这两个新的合作机制都并非要冲击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关键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中非合作论坛还在合作框架内为非盟提供了一个特殊位置，让非盟充当中非交流的媒介。根据“16+1 合作”的中期规划，中国-中东欧合作不得与欧盟立法冲突（例如合作不得与《中欧合作 2020 战略规划》冲突）。为了使新的合作机制不与现行国际秩序冲突，中国做出了巨大努力。但也有一些评论认为，新机制的出现破坏了国际秩序。正是出于对此类言论的担心，中国政府一直强调这两项合作机制是对现有体制的补充，而不是正式组织。

结论

本文要强调的是，尽管非洲与中东欧地区存在巨大差异，但中非合作论坛与“16+1 合作”还是有很多共同特点。通过这些共同点的归纳，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为了加强跨区域合作，正在推动一种新的模式。从国际政策层面来看，这意味着中国首次站在了地区的视角，也真正站在了全球的视角，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上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机制。进一步来说，两种机制的共同点也表明中国有着连贯一致的世界观，能够用文化力量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由此看来，非西方的价值观和基于规范的国际机制可能会是国际政策的另一种选择。但是，为了防止新机制看起来是对现有国际体制结构的挑战，中国政府也做了很多努力，有意识地让新机制融入到现行秩序中去。但新旧体制毕竟存在差异，其中还是有很多困难和张力。最后结果是中国领导下的灵活的、非意识形态的、注重效益的机制成功，还是现行国际秩序下的传统机制胜出，还要看哪种模式更符合新时代全球化的要求。

翻译：黄昕蒙

尼泊尔抓住“一带一路”机遇

Pramod Jaiswal

在“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之前，尼泊尔就已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会议在北京举行期间，尼泊尔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部部长向中国交通运输部部长提议，期望中方未来在尼泊尔边境开辟道路与铁路建设。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将观察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倡议背后的驱动因素，以及尼泊尔即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相当远大的经济发展计划，同时也可能是中国 21 世纪的重大战略。自从习近平主席在 2013 年年末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全球已经有近 66 个亚洲，非洲，中东以及欧洲国家加入该计划。“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最具雄心的外交政策与经济计划，也是习近平主席理想规划，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穿越中亚，连接中国与欧洲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连接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一系列道路网络，高速铁路，供电线路，港口，管道，光纤光缆以及其他基础设施构成这两条线路。粗略计算，中国投入了 4 万亿美元建设“一带一路”，沿线人口占据世界总人口的 70%。

“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驱动因素

中国重振古代的丝绸之路有以下几大原因。第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家，中国首先要做的就是减少全球货物运输的成本。第二，中国国内建筑材料大有盈余，所以需要在海外寻求机会。第三，聚焦于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使人民币获得更高的国际地位，进而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第四，通过新建的管道运输，“一带一路”能够确保中国对于中亚，俄罗斯和东南亚深水港口的能源供应。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也是第一大石油净进口国。自 1980 年以来，中国能源需求量的增长已经超过了 500%。第五，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当地的经济也会相应增长，从而对中国的商品以及服务产生更多依赖。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通过中国南海以及印度洋连接中国与欧洲。中国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规划六大经济走廊，分别是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 - 中亚 - 西亚、中国 - 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

一带一路与尼泊尔

尼泊尔一直处于两大经济体之间。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 2030

年，中国将会赶超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同时，就购买力平价而言，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会排在世界第三。尼泊尔虽然是个小国家，却没有因为这些邻国的发展而受益，这是有原因的。尼泊尔一直在经历漫长的政治转型与动荡，不仅缺乏基础设施建设，与邻国也缺乏互联互通。中国有句话说得好——想致富，先修路。连通性促进国际经济增长，缓解贫困问题，让数以亿计的人一同着手处理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基础设施建设的匮乏。缺乏基础设施建设就会缺乏连通性，没有连通性就无法进行经济交换，从而势必导致经济增长乏力，繁荣富强就只能是无稽之谈，更不会有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循环往复。

尼泊尔边境都是印度最不发达的地区，比如北方邦，比哈尔北部以及北孟加拉。更确切地说，是北方邦的皮利比特，巴赫赖奇，萨巴斯提，巴尔兰普尔，比哈尔的东查姆帕兰，西塔马尔希，马杜巴尼，阿拉里亚，吉申根杰。所有这些地区都是印度发展比较滞后的区域。同样的，尼泊尔的北边是中国的西藏自治区，与其相邻的是定日县等地区，这些也是中国最落后的地区。虽然与尼泊尔相邻的是世界上两大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但是中印两国的落后地区就像绝缘体一样隔绝了发展。中国和印度都投入了大量资金来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但是要想惠及尼泊尔是需要花时间的。应对这一问题的另一种方法就是和中印两国的发展地区产生往来，比如印度的孟买，海得拉巴，新德里和古吉拉特，或者是中国的上海，北京，广州，重庆，成都和天津，以此够促进尼泊尔的发展。

机不可失

历史上，因为地理优势，尼泊尔一直都是南非和中国经济来往的中转站。只要提供羊毛，盐或者是其他商品，商人就可以从尼泊尔通过喜马拉雅地区。这种自由且不受限制的交易方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或者六世纪，在那之后的几个世纪，交易也一直都很活跃。大量尼泊尔的商人居住在西藏的拉萨以及其他地区。在马拉王朝时期，拉萨的商业非常发达。但是现在，尼泊尔和中国有指定的贸易往来路线，比如塔托帕尼，胡姆拉等路线。2006年，在尼泊尔共产党的竞选宣言中提及通过建设四条公路，连接中国与尼泊尔。同样的，为了与中国陆上交易而新开辟的Kerung路线，以及受到波特科西河洪灾影响而阻塞的科达里段阿尼哥高速公路，都为双边的交通贸易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虽然尼泊尔和中国两国关系友好，但是直到2016年3月的联合声明中才第一次提到，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尼泊尔和中国将会启动重大工程。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尼泊尔可以重振南非与中国之间经济中转站的地位，它可以通过三方面的行动从“一带一路”倡议中获益。其一，尼泊尔可以修建高速公路与铁路来提升与中国的连通性。其二，尼泊尔应该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寻找自己的定位，尼泊尔可以在加德满都

与昆明和加尔各答构建往来，因为一方面，青藏铁路已经延伸到了日喀则市，另一方面，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已经有所提升。其三，是好好利用未来尼泊尔—印度—中国的三边关系。这三个国家都可以投资尼泊尔的水力发电和旅游业，尼泊尔水资源丰富，有巨大水力发电的潜能。印度和中国都有资金和技术来实现水力发电，同时由于印度能源不足，可以作为多余电力的市场。另外，尼泊尔风景秀丽，可以吸引中印两国的中产阶级前来参观。

尼泊尔已经开辟了南北道路走廊，提升了中印两国通过尼泊尔互联互通的可能性。加德满都与尼兹加德之间的快车道减少了从拉克绍尔到Kerung近150公里的路程。青藏铁路延伸到加德满都，直至蓝毗尼，这条线路将会给尼泊尔带来巨大的机会。沿线将会建立几个特殊经济区。尼泊尔也将会成为中国西藏以及印度北方邦和比哈尔的新贸易线路。

尼泊尔面临的挑战

尼泊尔拥有诸多机遇，但同时也面临些许难题。印度方面在意中国设立在印度和尼泊尔边境的几个研究中心。同时，中国的青海铁路将会延伸至加德满都和蓝毗尼，距离印度边境仅17公里，如此大范围的基础设施建设，印度也不会置之不理。为此，印度提出建设六条轨道交通与印度的铁路系统相连。这些铁路的覆盖了从印度的拉克绍尔，焦格伯尼，杰伊纳格尔到尼泊尔的比耳根，比拉特纳加尔和巴迪巴斯。在印度北方邦，铁路将会连接瑙坦瓦与尼泊尔根杰，新杰尔拜古里与卡卡比塔。以国家主权与其它战略性考虑为由，印度强烈反对“一带一路”倡议。印度并没有参与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论坛，也告诫国内学者，只有得到许可才能参与论坛。印度对于尼泊尔的外交政策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印度不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尼泊尔来说也是一个难题。因此，为了从“一带一路”倡议中获益，尼泊尔对两个邻国都需要更加真诚地沟通，并信任两国，以构建更和谐的外交环境。否则，“一带一路”给尼泊尔带来的不会是繁荣，只是美好的愿景罢了。

翻译：钱王杰

德国看“一带一路”

Viktor Eszterhai

2016年12月，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会见了《南华早报》，谈论中欧在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中所扮演的角色。与通常的外交语言不同的是，这次访谈对“一带一路”项目与中国的中东欧（CEE）政策（主要是“16+1合作”）进行了几方面的尖锐批评。德国在中东欧地区扮演重要角色，因此研究德国如何看待中国外交政策的宏伟远景，对于匈牙利尤为必要。

对于德国和“一带一路”的早期看法

欧盟各国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态度两极分化，西欧国家与中东欧国家（CEE）国家之间有一条明显的界限。西欧国家对于中国这个宏伟计划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但是中东欧一些国家团体（中国用“16+1合作”聚集起来的国家）却认为，“一带一路”提供了一个帮助该地区打破了半边缘地位独特机会（参见：Kelet-Közép Európa és Magyarország helye a Selyemúton）。

德国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13年在中国宣布此计划后，当时德国政治精英与新闻界表示对此计划大为赞赏。因贸易对于德国经济尤为重要，“一带一路”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德国扩大出口市场；其次，德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与中国企业建立更好的合作关系，以增强德国企业在中国的影响力，并已经在铁路、物流和航运方面与中国进行了协商。2016年3月，德国国营的德国铁路公司（DB）和中国铁路公司建立了合作，私营物流巨头DHL也和中国成都市签署了合作意向声明。



习近平到访杜伊斯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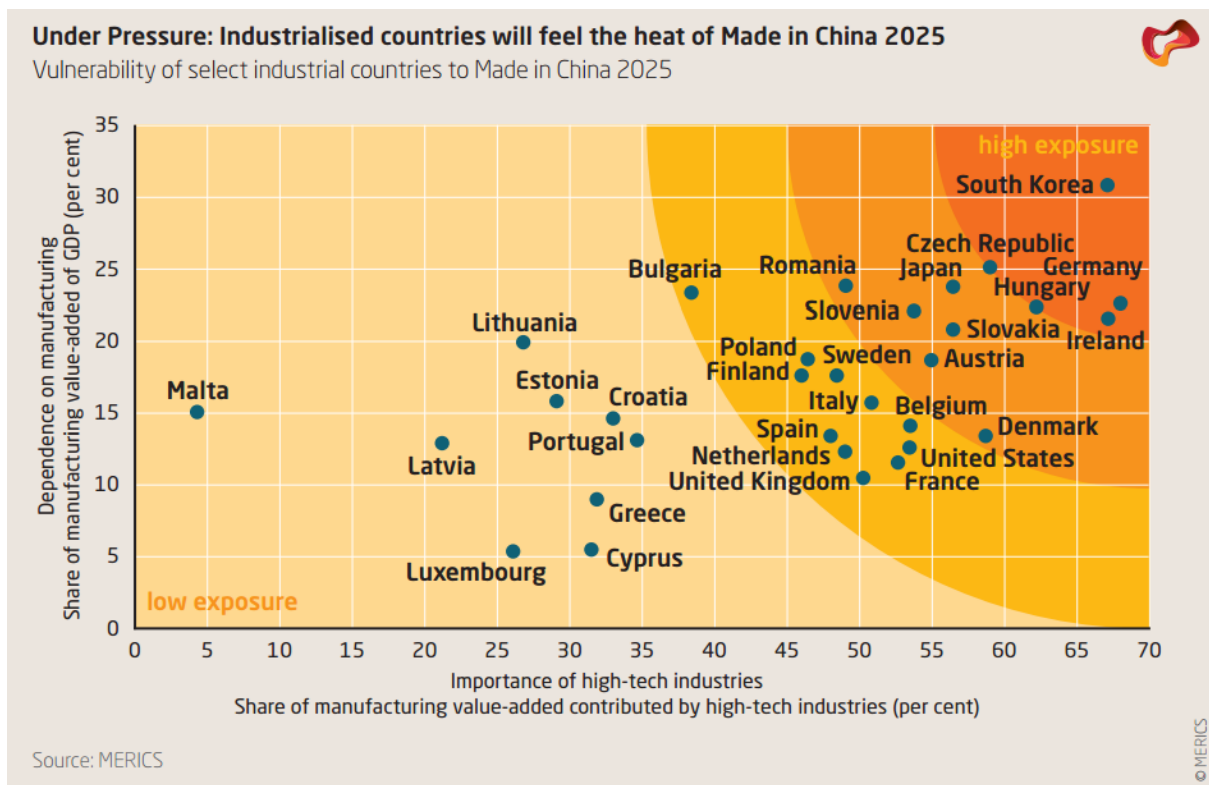
德国的两个重要的港口汉堡和杜伊斯堡，也对“一带一路”倡议非常感兴趣。在德语中，丝绸之路（Seidenstraße）是以前的说法，这与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相关。虽然这好像不太重要，但也不应该被完全忽视，因为中国在媒体发布声明时，运用了这个旧说法显示出怀旧和正面积极的意义。

2014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德国，证明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受欢迎程度，在此期间重庆和杜伊斯堡之间的铁路也正式开通。多次高级别谈判结果也预示，在接下来的短期内，该项目仍将得到积极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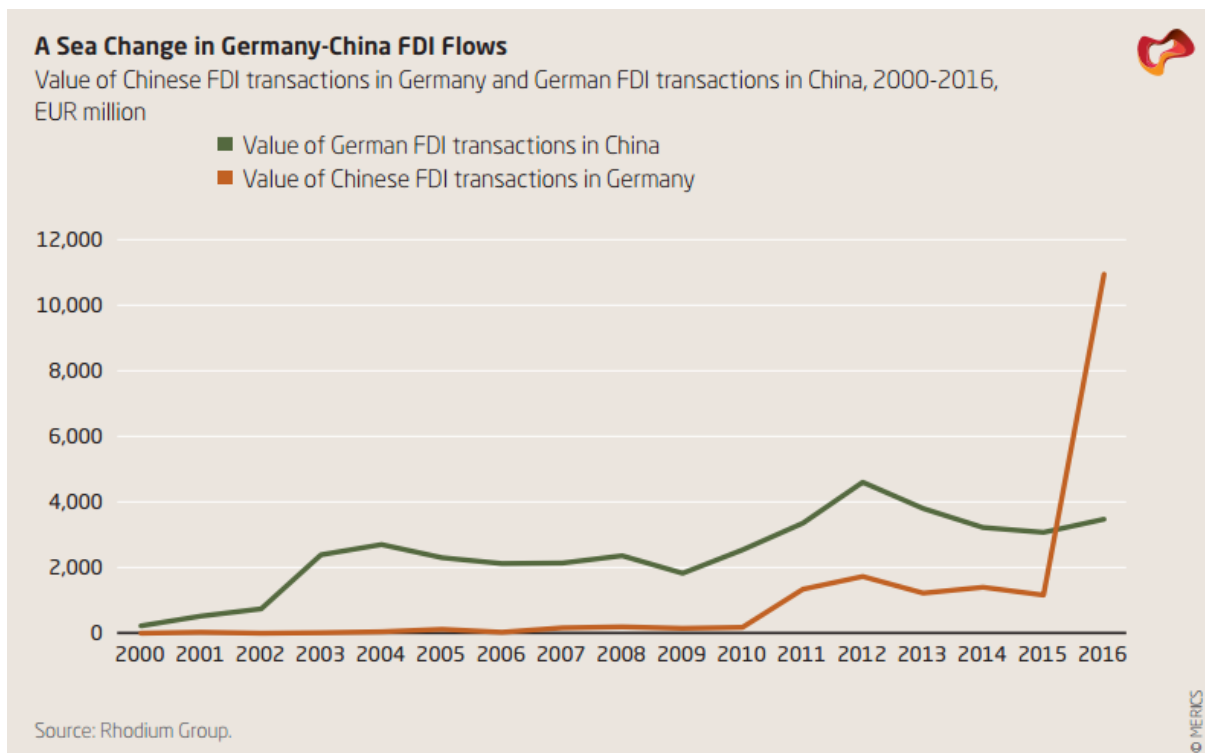
但与此同时，通过迈克尔·克劳斯的访谈，我们也可以清楚地发现，2016年出现了重大改变。

对于“一带一路”的态度转变

德国对“一带一路”的态度转为消极，主要是由于经济因素的影响。一开始德国对“一带一路”感兴趣是认为这对于开拓出口市场有利，但种种迹象表明实施与预想背道而驰。虽然中国现有科技不如德国发达，中国产品不会对德国工业构成威胁，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这种情况会迅速改变。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中国制造2025计划”目标在十年内，在一些中央支持的领域，积极开展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此赶上世界上发达的工业国家。德国在中国研究方面的领先机构之一MERICS，将此作为首要研究问题，这也表明这项举措在德国受到高度关注。MERICS在2016



受“中国制造2025计划”影响最大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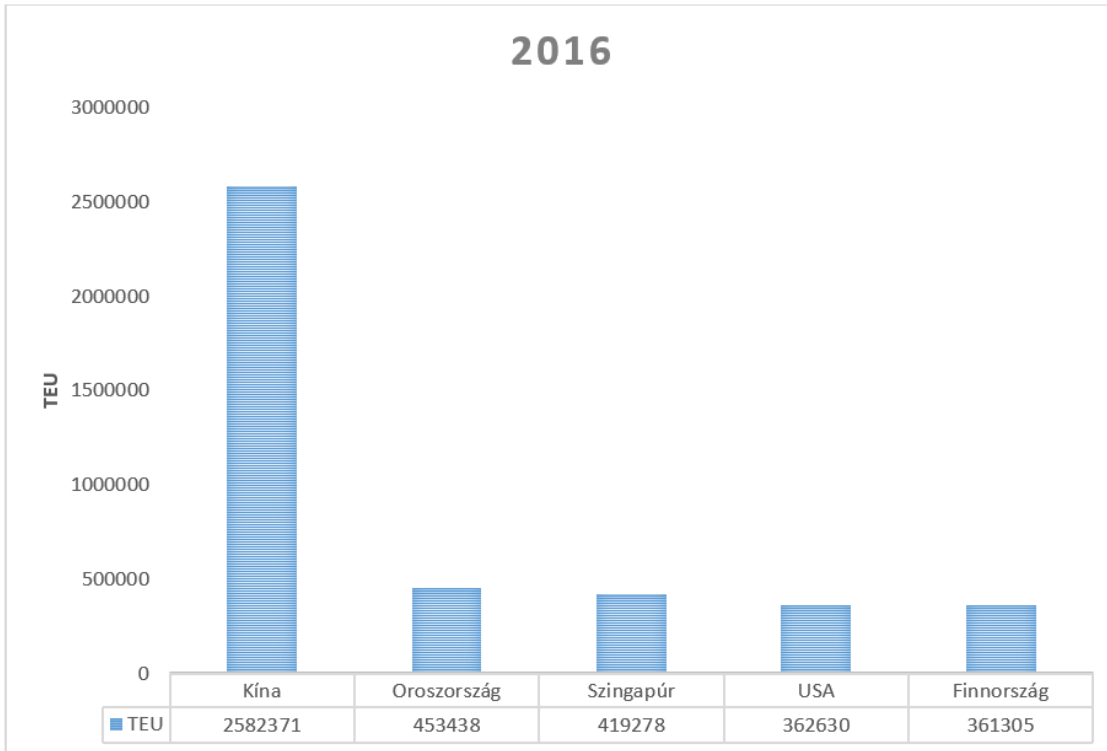


2000年至2016年期间中国和德国在对方国家的营运资本投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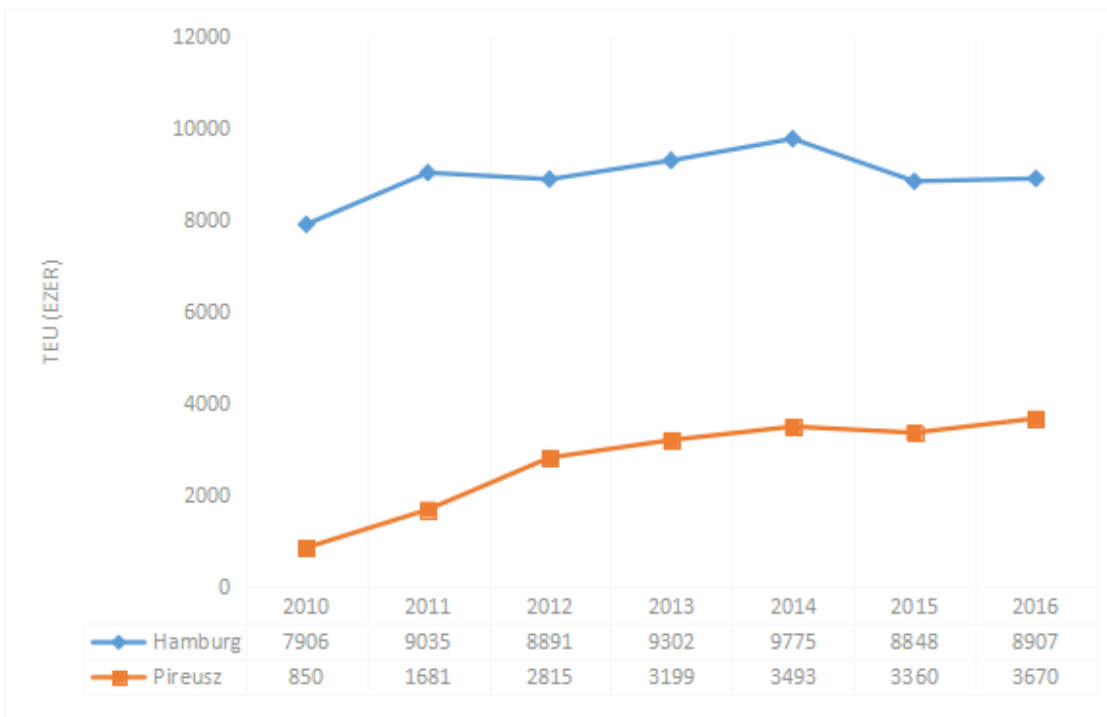
年12月完成的一项研究显示，尽管到2025年中国工业的发展仍无法赶上德国的标准，在一些德国人为扶持的领域中，但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国际市场，中国企业都有可能成为德国企业的竞争对手。克劳斯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对此担忧，他认为“中国制造2025计划”会带来贸易保护主义，这可能会导致外企被挤出中国，因为本土企业受到中央支持，在中国更容易成功。这一切都将对德国造成不利影响。中国是德国的第五大出口市场（760亿美元），德国对华已经有相当大的贸易逆差（177亿美元）。“中国制造2025计划”之下，较高价值但需要快速运输的中国新产品也可通过“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主要是铁路，包括铁路和海运运输）进入德国传统市场甚至是欧洲。这将给德国工业带来竞争压力。

其次，在欧洲近几十年来，中国公司收购案例数量急剧增加。MERICS强调，在高科技公司中，这个增长尤为显著（最广为人知的案例是中国美的公司以45亿欧元收购德国库卡公司），这也“人为”地减少了中国企业技术不发达的因素。因此，德国为防止中国企业收购德国一些战略性公司，向欧盟提交了一个法案，根据此法案，欧盟成员国可以防止具有政治目的的收购，或在收购方不能给予被收购方技术转让时可以保护本国公司。

在中国的支持下，欧洲南部和东南部的港口发展迅速，特别是比雷埃夫斯港，德国原本对此也是热烈欢迎的。与绕行欧洲大陆的轮船运输相比，未来建成的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铁路将大大缩短中国货物运输到西欧的距离。这一切都会对汉堡港造成不利影响，而汉堡港被认为是中欧贸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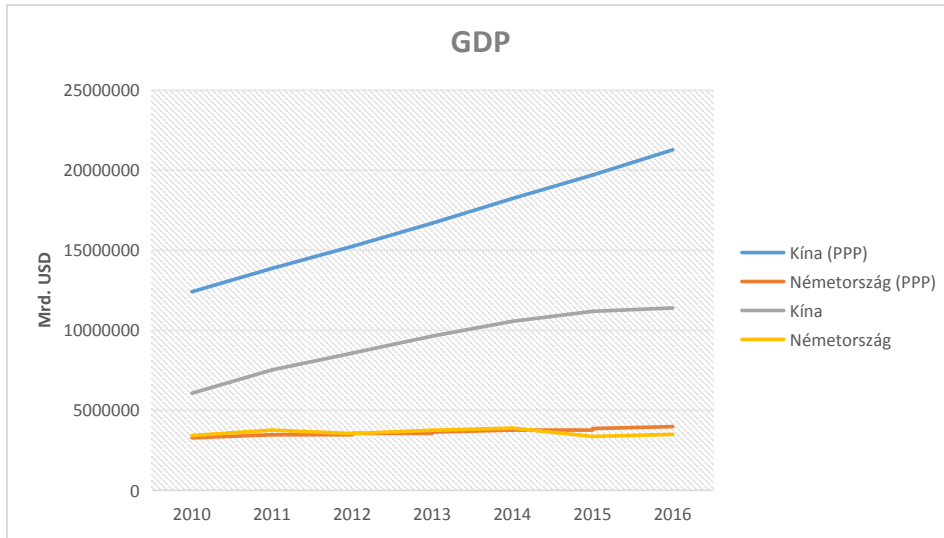
汉堡港五个最重要的商业合作伙伴（来源：汉堡港）



汉堡和比雷埃夫斯在 2010 年至 2016 年期间的集装箱营业额

中心。汉堡超过 30% 的收入来自 2016 年与中国的贸易（260 万 TEU）。

尽管某些德国公司，特别是 DHL，认为南方港口服务更快、更有优势（与汉堡相比，从比雷埃夫斯港进入的船只航运周期可缩短 9 天），但并



德国与中国经济力量对比

不是整个德国都这么认为。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是近年来汉堡港受到比雷埃夫斯港的影响，集装箱周转停滞，而从长远来看，一带一路内铁路货运量的增加，将继续减少德国港口的作用。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在德国备受质疑，被认为是凸显了中国潜在的政治野心。在德国，很多人认为“一带一路”削弱了美国的霸权。虽然中国专家强调，“一带一路”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可以将欧洲重新置于世界历史的中心，但欧亚经济复苏时期，德国力量将远远小于未来将继续增长的中国。

因此，德国并不一定想要重建世界秩序。在当前世界秩序中，德国与出口发达的工业产品模式融为一体，军费长期保持低廉。

最后，德国认为，中国在中东欧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这对德国是不利的。“16+1合作”是近来中国在国际机构上的创举之一，德国对此持负面态度。在访谈中，克劳斯强调，中国在该地区建立平行机构，机构内的国家对欧盟的承诺与此是互不兼容的。德国对“16+1合作”提出质疑原因有二。首选，中国的投资政策未能与欧盟的投资规则有效衔接，这一落差可能会对欧盟的政治统一造成一定的伤害。其次，德国人担心中国利用经济实力对一些国家施加政治压力。意思是，因为“16+1合作”涉及的国家数量众多，中国可能会利用这个合作，频繁便利地干预欧盟内部事务。由于德国经济关系强大，该地区又被视为德国政策的传统支持者。因此，德国有意通过欧盟渠道，调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这也并非偶然。

对于匈牙利及中东欧地区的影响



德中关系进一步恶化可能对中东欧和匈牙利带来严重风险。更重要的是，如果德国实行保护主义政策，这将引发中国的反击，对该地区会造成严重影响。不仅在经济方面——因为中国是中东欧地区和匈牙利由德国企业促成的重要市场——而且通过“一带一路”改变半边缘地位的希望也会

立马破灭。因此，中欧和东欧地区和匈牙利的利益其实是连接欧盟和中国而非分裂两者，中欧和东欧国家起了桥梁的作用。

虽然基于上述内容，这个前景似乎有些暗淡，但事情有可能迅速朝反方向发展。只有建立在中国和德国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一个由强大的国际机构组成的单一全球商业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很可能会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而这可以促进德中两国建立更密切的合作关系，“一带一路”也会为此提供便利。

翻译：李雪莹

中国式高风险

Evan A. Feigenbaum

中国的公司是否对于风险有着无底线的期许？

这个问题表面看起来很荒谬，因为所有人在投资的时候都需要关注钱易手之后会发生的事情，这点不证自明。然而今时今日很多关于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活跃度的文章都持有这样的观点，或者至少隐约表达：中国的政府机构和龙头企业们都对风险较为宽容，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可能对风险到了忘我的地步。

我们常看到说中国将金钱大量投入深陷贪污的地方，或者常受到恶劣商业气候的折磨，或者遭遇社会矛盾的阻断，或者被政治斗争撕裂，在某些国家，甚至为内战所困。

还要考虑的一点是：根据纽约时报，中国是在世界上最敢于冒风险的五个国家中排在首位。

然而，北京投入相当于几万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倡议则令人咋舌地承诺了一系列西方的公司不敢涉足的国家。

最后，在海外并购中，中国的国有企业扮演着不成比例的重要角色。这些公司常被定性为特别能容忍风险的公司，因为他们受到中国国家的隐性裱糊，不会破产。

但是当然，正如所有单一化的说辞一样，以上这一类的说辞也是未免太单一了一点。

北京并非非理性的。那些中国龙头企业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的也都不是盲目的。所以他们不可能对于风险的承担有着无底线的渴求。当然，中国的政治领袖有他们的底线。事实上，这也是国家目前正在制裁至少某些类型的交易和某些形式的现金外流的原因。

然而，关于中国的公司是否以及如何评估不同的风险这一潜在的问题就变得更有意思了。十年前，很少有中国的银行或者企业有成熟的风险分析机构。如今，这点正在改变，监管和合规的功能被增强了，国际风控顾问参与到了质询中来，金融机构和公司内部建立了风险评估的操作体系，中国政府附属的一些智库发布了“风险排名”和相关目录。

这还不是全部政治上的和公众对于过度风险承担的宽容，无论这种风险是真实的还是预想的，都在日益减少。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强有力的国家财富基金，即中国投资责任有限公司（中投）便因致损投资而遭到点名批评。中投之后改变了一些其投资战略。其他一些中国的龙头企业也因为风控不力、风险过大、或者（从中国国家有利地位的角度来说）

错误风险类型而遭受了打击。

简而言之，新现状似乎开始出现了：中国对于风险管理和缓解相当关注，这种关注的程度远高于很多观察者已经肯定的程度。并且因为风险管理实践将进一步升级，这将可能为中国和世界互动的方式提供重要的指征。

增长的风险，变幻的说法

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角色和投资份额的切实扩张，有些解释性的问题值得一问：中国企业如何考虑地缘政治、不同国家的及发达和新兴的经济体的国家政治，也可能不考虑，这些都变得更加不稳定。

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和质疑的是，为什么普遍的关于“无穷高风险的中国”一说到底怎么先被提出的。我怀疑有一个原因是这可以肤浅地逼中国执行一系列惯例的风险测量。

看看这两件事：腐败和对做生意的宽松化。

透明国际所发布的清廉指数将索马里列为世界上 176 个国家中最腐败的国家。然而一眨眼说变就变的是，中国正和索马里的邦特兰州州长签订石油和渔业的相关协议，建造机场并且捐助重建和水灾的资金。

透明国际的第二腐败国家是哪个？南苏丹。现在再眨眨眼，中国又出现了，这次是对石油部门投资并且帮忙成为一个未来的和事佬。

同一件事也可以被称作为“做生意”的风险。世界银行广受尊重的“生意”指数排行同样将索马里列为实际上最难做生意的地方，然而威权主义的厄立特里亚排在次位紧随其后。再来看看，“高风险”的厄立特里亚对于大胆的中国投资者来说并不是显著的阻滞。中国是该国最大的外资投资者，在金矿、农业和能源部门都非常活跃。

然而中国的十足的活跃度，即单单只是在很多地方都插一脚，还不算完事儿。另外一个鼓吹中国的冒险精神无穷无尽的理由又出现了，这种声音常出现在最近十年来的欧美媒体，那便是以北京为后台的投资一揽子计划都“不计回报”，换言之，中国对于风险几乎是充耳不闻的。

举两个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例子，都来自于著名的纽约时报：在乍得，时报在 2007 年的一篇配图文中表示，中国“为石油钻营，不计回报”。在苏丹，同一份报纸向世人展示，西方政府日渐对中国“不计回报的援助政策”所带来的启示表示忧心。最终，这份报纸提出，“不回报中国”的削弱作用蔓延在整个非洲大陆。

但问题其实在这里：

中国以国家为后台的投资计划其实总是有回报期待的，包括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开始以新姿态步入世界舞台的时候。北京一直以来将一些出口资金融通、附带条件的信贷以及一些直接投资作为条件，这些因素可能有别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项目，却切切实实是在施加条件。

简言之，一项投资的本质和质量与中国决心攫取现金毫无关联从来就不是真的（更不要说这个那个国家针对北京的投资政策了）。

对此有个例子来说明风险管理：尽管有那些对北京政策贷款“不计回报”的说法，中国的进出口银行保持了对出口卖方和买方信贷度、优惠贷款和船运出口份额中需要有 50% 中方内容（增值）的要求。并且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即国家另外一个大型的政策性银行，也有类似的约束。

这一内容相关的举措是否有条件地提告了中国产品的使用？那当然是的。但是通过确保中国公司总能从自己这方、他们的中方合作伙伴和在祖国可以求助的方面获得供给、材料和产品，它反映了缓和供应链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忧虑的适度努力。

同样是事实的是，即使是最强劲的国家背景的中国企业龙头也不会简单地去到任何地方，付出任何代价，贿赂任何人或者满足任何政府的冲动仅仅只是为了“达成”协议。

事实上，有些中国公司甚至放弃了一些生意机会。有一个矿业公司在 2011 年就在巴基斯坦这么做了，正是因为察觉到了风险。在几内亚这样的国家，当地官员很快就领会了意思。“这里的政治局势不是很稳定，”中国大使火正德在 2009 年对纽约时报哀叹，一位几内亚的财政官员在另一篇文章中回应道，“中国改变了他们的策略。他们是不会在一个市场环境不确定的不稳定国家投资五十亿美元的。”

但是如果现在中国不是鲁莽豪掷这点能被更好认识到了，那严格说来所谓“回报”背后到底是什么呢？

中国政府和企业层面的选择是否显示了政治意图？国家安全目标？减弱经济风险的企图？或者是三者的结合？

我的回答是我们正在见证中国模式更加成熟化的迅猛发展，先是管理然后平衡多种形式的投资风险：地缘政治风险，政治和实际安全风险，以及当然还有单纯的经济风险。

进化和瓦解

至少由我的经验看来，中国政府对于如何更好地管理海外投资风险所进行的挣扎已经持续了十五年左右的时间。

2002 年，在小布什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我曾经是国务卿鲍威尔政策策划组的成员，负责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当布什总统在 2002 年 3 月启动了千年挑战账户（MCA），将美国发展活动的重点转向良好治理和反腐败指标时，这一新的、更像企业行为的举措引起了北京的注意。

在一轮政策规划会谈中，中国将一项发展的讨论融进了一项范围更广的投资讨论，重点提到了中国企业和公民在世界范围内遇到的风险，包括了腐败和遣返资本的壁垒。这使得在 MCA 的背景下中国方面的假设和预

期的要求产生问题。

当然，这是在习近平主席发起规模庞大的“一带一路”倡议之前的11年。在一带一路中，由于它和战略及政治目标紧密相连，可能在一些新思潮方面有点短路。这一计划包括了丰富多样的在不同行业的项目，这些项目跨越至少三个大洲的截然不同的国家，它们都有着各不相同的投资环境。这是非常多样化的，并且非常难以归纳出项目或商业层面的蕴意。但是在一带一路的整体努力中贯穿始终的是中国政府作出的巨大整体允诺，例如，2015年一笔给巴基斯坦的460亿美元的启动资金。政府领导经常将这些与官方访问捆绑在一起。所以这些计划和项目都在非常紧的时间框架内以及很大程度的政治而非经济背景下进行。在一些情况下，这可能意味着在项目层面勤奋不足以及对风险的不恰当关注。

因而不出意料的是，虽然风险评估不一定影响整体的、政治导向的允诺，但它可能在商业和合同谈判启动的时候开始发挥作用。

事实上，这肯定是一带一路前后的这些项目要么没有被落地（缅甸水利发电，被地方上的反对所拖延），要么被延迟（阿富汗铜矿，主要由于技术限制被拖慢）的原因。

在一些情况下，具体交易的条款在达成意向之后会有所改进。随着中国技术和风险意识的增长，合同争议也随之出现了。

例如在阿富汗的艾纳克铜矿，合同上的讨价还价已经在最初的协定之后持续数年，因为中国国有企业的这一方在五个反面都寻求重新谈判的可能，包括特许使用金，因为对它的活力、成本和时间节点的评估都已经变化了。

这样就有了突兀的安全风险的情况，这使得一些项目停滞不前，另外有些也被拖慢了。例如自2014年起，想要尝试破坏中巴经济走廊的激进分子已经杀死了超过40个巴基斯坦人。因此巴基斯坦政府不得不在俾路支的乡村地区派遣准军事武装来保护项目进程，因为当地法律文书和警察都受到了约束。

最终，节奏、范围、结果以及这些中国投资的回报在项目层面都大相径庭，这其中主要的导致因素就是技术、商业、政治和安全的风险。

对风险的进步性举措？

此处有些时间值得推敲：

首先是在商业风险，尤其是海外的商业风险评估中，中国国家和中国公司——无论是公有还是私有——变幻的关系。

正如 Erica Downs 所指出的，“中国公司”不真的是一个合作的整体，在海外有些公司有时相互竞争，很少有比较一致的诉求。但有一点对我来说是较明显的是，中国国家是风险的最终仲裁人：投入或者撤回资金和常规

化的管控，在一些特定的投资中做中间人，有时限制在一些特定国家的投资同时再把钱投到别的地方去。

公众感受是这一计算中非常有趣的一个维度。例如，中投公司在网络上被网友痛击输光“人民的钱”，因为其收益不佳、投资失败，先是在全球金融服务公司股票投资失利，接着是由于商品降级回收。同时，债台高筑的经济体极尽所能地争相吸引到北京可观的投资资本，来分一杯羹。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下此类投资在国内要吸引买家越来越困难。正如微博上几年前一条高度概括的推文所述：“宁救温州，不救欧洲。”

然而比单纯的公众反对声音更具有意义的是共产党和政府对于一些经济风险其政治影响的自我评估。中国的公司，甚至是私人企业，如果他们的投资因为没有兼顾国家的其他目标而被认为“过于冒险”，都可能止步于瞄准目标的阶段。

第二个问题涉及到平衡折中，即如果一项在某国的投资，甚至是一项赔钱的投资，仅仅只是为了满足地缘政治和战略的目标，北京是否愿意容忍国有企业长期的损失？在此，阿富汗的铜矿特许权和一些在巴基斯坦的投资值得进一步关注。

第三，中国政府目标不仅仅利用投资作为一个管理国家的工具用来作杠杆，同时也通过外交和关系建立，前瞻地缓和了对中国企业的政治风险。看下菲律宾就可见一斑：北京与马尼拉针对中国南海一触即发的关系从不妨碍中国在菲律宾的投资，但是最大笔的交易出现时机不出意外地与相对友好的菲律宾政府任期不谋而合。

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在菲律宾国家电网公司占有 40% 股份正是在相对友好的阿罗约总统任期内。而对于现任总统杜特尔特，北京采取了更加积极的交易促成方式并允诺进一步加强的投资这样易于接受的立场，这条挂着的胡萝卜，这不仅仅因为杜特尔特在南海问题上更加有弹性的立场，也因为北京政府评估到了这届政府会在马尼拉成为一个更加可靠的、对中国投资友好的伙伴。

第四，北京在中国公司全球范围扩展的情况下，似乎确定对于投资风险有着更审慎的态度了。

中国社科院定义的 57 个国家的风险产品可能在此有些指示意义。在 2017 年，它标注了一些对中国相对不友好的国家为最好最安全的中国投资目的地，同时抹黑一些中国外交和战略上的亲密伙伴，例如委内瑞拉为“风险最高”的投资地。

美国在“与中国关系”的各种指标排在 30 位，却不出意料地在投资目的地这项排在第二位。

巴基斯坦排在与中国关系最好的位置，却在总体投资风险上排在 33 位，低于土库曼斯坦和柬埔寨。

这就使得一个很重要的点非常明显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对于风险的渴求有一个明显的转向。进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排在前列的目的地事实上是稳定的、可预见的、低风险、有成熟业态的经济体，包括了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和英国。这些国家的相关项目正是中国企业，特别是私人企业，投资组合多样化的组成部分。

第五，随着中国对于投资风险的敏感度越来越高，甚至对于传统的风险因素，例如腐败，也都有空间来协调甚至合作。

有一个明显的背景是，新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尽管确实有北京这样的背景，但是也真的进化为一个新的多边开发机构，也为双边借贷中中国自己的机构、指标和实践提供了潜在的回馈机制。

正如我以前的上司，也是前世界银行主席鲍勃·佐利克所说，在亚投行的背景下，机构的学习能力和标准设定是有可预见规划的，这其中按逻辑包括了反腐败、透明化和治理的相关议题。佐利克表示，世界银行在这一领域和伊斯兰及阿拉伯的基金、区域银行和私人部门也有过类似的努力，他也表示，现在可以和北京支持的机构也这样合作了。

此处点睛：我认为对于思考中国这一整体，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我们都到了需要转换新思路的临界点。

中国的资金一般来说比较随大流，所以它常显示了地缘政治的显著作用，换言之，北京会简单地将钱投到任何地方和所有地方来支持其战略目的。但一些趋势显示，北京已经极大程度地对于投资限制和宏观经济条件非常敏锐了。

坦率说，这是一件好事。

中国可能在走一条其他东亚小龙们走过的路，甚至是美国、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走过的路。随着在投资活动新领域的经验增长，政府和投资者越来越谨慎和有条件地行事。但在这发生之前，他们可能看起来吃相难看、挥霍无度。正如其他国家经历过的那样，中国今日正是这幅模样，只是其规模更大罢了。

macropolo.org

中国银行业：无止境的猫鼠游戏造福大玩家

Alicia García-Herrero

监管旋涡中千变万化的融资渠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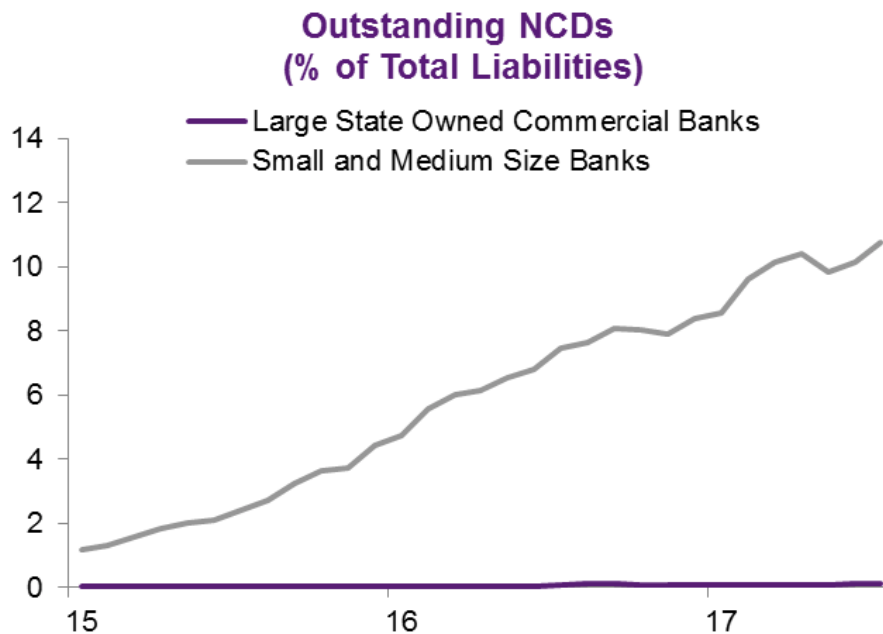
当一扇门关上时，总有另一扇门会打开。如今，中国领导层聚焦去杠杆，因此监管部门对银行的限制增多了不少。这也不是银行第一次陷入监管旋涡了。无论是回购协议的使用，理财产品（WMPs），还是最近的可转让定期存单（NCDs），银行在不断演化的监管条例面前不断翻着花样玩猫鼠游戏。

在纷繁的金融创新助力下，中国的杠杆进程一直未减缓。在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紧缩的影响下，流动性愈加匮乏，致使融资成本上涨。上海银行间拆放利率（SHIBOR）已处于自2015年后的高位，悬停在接近3%的位置。

监管压力的介入较以往更迅速

中国央行引入了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来防范金融风险，一季度一评，评估体系纳入了包括资产负债情况、资产质量等众多指标，不合格的银行将受到惩戒。

此后，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又纳入了表外理财，而中小型银行主要就是



Source: Natixis, WIND

依靠理财产品提升财务杠杆、挽回由于较低的净利息收益率造成盈利下降。自从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纳入表外理财后，未尝贷款在 2017 年 5 月收缩至 28.4 万亿人民币，减少了 1.6 万亿人民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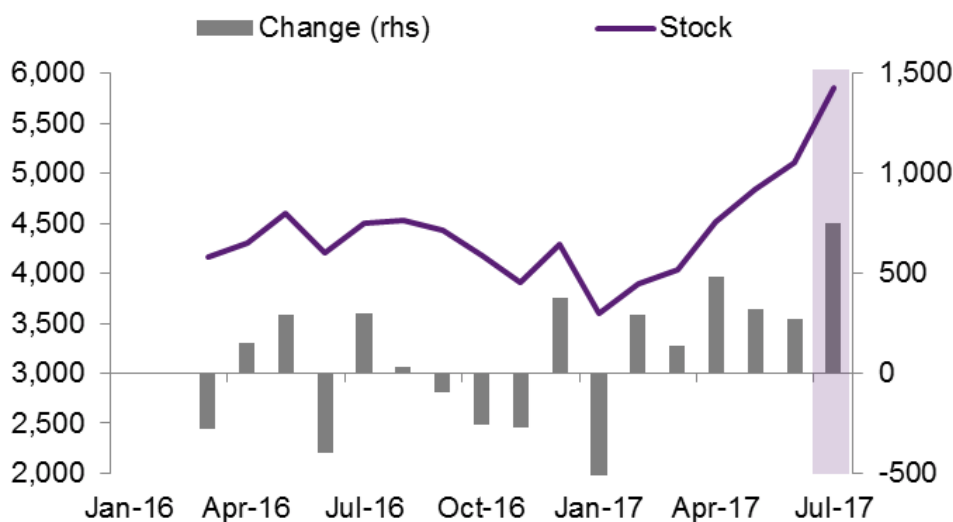
中国央行限制理财产品使用后，又将目标转向可转让定期存单的存款保险问题。可转让定期存单拥有期限短且无抵押权的特点，其融资成本甚至高于上海银行间拆放利率，这曾一度导致保险骤降，但从 2017 年 6 月起又开始呈增长态势。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缺乏其他选择，而且监管也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严格。

最重要的是，中国央行对于不同银行给予的压力差异甚大，对于缺少流动性的银行进行处罚的行为，致使那些无需担心流动性的银行从中获益。这意味着中国五大商业银行（均为国有）将轻易取胜（其政府背景保证了流动性，使其可以从避险买盘中获利），而所有其他银行都将成为失败者。

货币市场基金成为新中介

鉴于获得流动性越来越昂贵，那些缺乏流动性的银行最近调整了政策，转而通过货币市场基金融资。由于银行被施压减持同业资产，货币市场基金操作灵活的特点愈加突出。货币市场基金可以作为可转让定期存单的持有中介，并将其重新包装后面向金融机构投资人或者散户推出。事实上，2017 年 7 月货币市场基金有巨幅增长，一个月内就上涨了 15 个点，涨至 5.86 万亿人民币。而货币市场基金的规模也从 2017 年 1 月同业拆放市场的 6.4% 扩大至 2017 年 7 月的 9.5%。而 2017 年第二季度的数据显示，19% 的货币

Money Market Funds (RMB bn)



Source: Natixis, AMAC

市场基金都被用于针对可转让定期存单的投资。

这样迅速的扩张可能会带来额外的流动性风险，特别是当其中的四分之三的资产的都将于 90 天内到期。这类监管套利将继续扩大，直到问题达到此前理财与可转让定期存单的程度。不言而喻，这只会使中国已然很高的杠杠率更加高。

中国银行新型资金调度手段的骚动是中国金融创新的另一标志。与金融创新相关的风险确实需被仔细评估。中国监管部门明显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也是他们热衷于将各种新融资渠道纳入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的原因。然而，这却进一步推动了银行选择通过那些安全性问题更大的新型融资渠道进行融资。

另外，考虑到国有银行在中国银行业中占比巨大，融资问题其实也只对中国银行业的一小部分有影响。换句话说，当小银行挣扎于流动性时，那些大银行正获利于监管套利。而 2017 年第二季度的结果也印证了我们的预测，五大行可以从监管套利，而那些小银行的风险则明显上升。换句话说，银行业数据呈现的好转趋势不仅是因为经济条件改善，还因为监管套利。国有商业银行的净利息收益率提升的同时，小型银行却普遍没有提升。这主要是由于小型银行极大依赖的影子银行资金呈持续增长态势。

bruegel.org

中国去杠杆化？前路漫漫

Alicia García-Herrero

“去杠杆化”这个词最近在中国很热门。中国领导层明显希望缩小其巨额信贷规模，但其实未准备好为缩减信贷规模而牺牲经济增长。那么，问题就集中在了中国领导层近期为经济区杠杆化所做的努力是否奏效。

中国监管部门中，最乐观的已经声明，基于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骤减，中国已开始进入去杠杆化进程。然而，这种评估杠杆效应的方式过于狭义，与整体市场传递的信息不符。而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绝大部分杠杆效应都发生在银行系统之外。

事实上，有一些更宽泛的评估手段被运用于评估中国经济的信贷规模。像中国人民银行就编制了社会融资规模（TSF）指标，反映金融体系中的信贷与流动资金情况。该指标显示中国的信贷增速仍高于名义GDP。这还不包括那些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对于社会融资规模的定义而未被纳入统计的其他形式的影子银行。社会融资规模的长期评估显示，去年一年内，社会融资规模相比较GDP上涨了11个百分点，2017年7月达到了27.1%。

这样看来，现在讨论中国经济的去杠杆化似乎为时尚早。理由如下：经济中的信贷（社会融资规模或者社会融资规模的进阶版）积累速度持续高于经济名义增长率。另外，信贷的反面，债务仍持续积累，包括商业债务、家庭债务以及政府债务在内，截止至2016年年底，已增长至到GDP的2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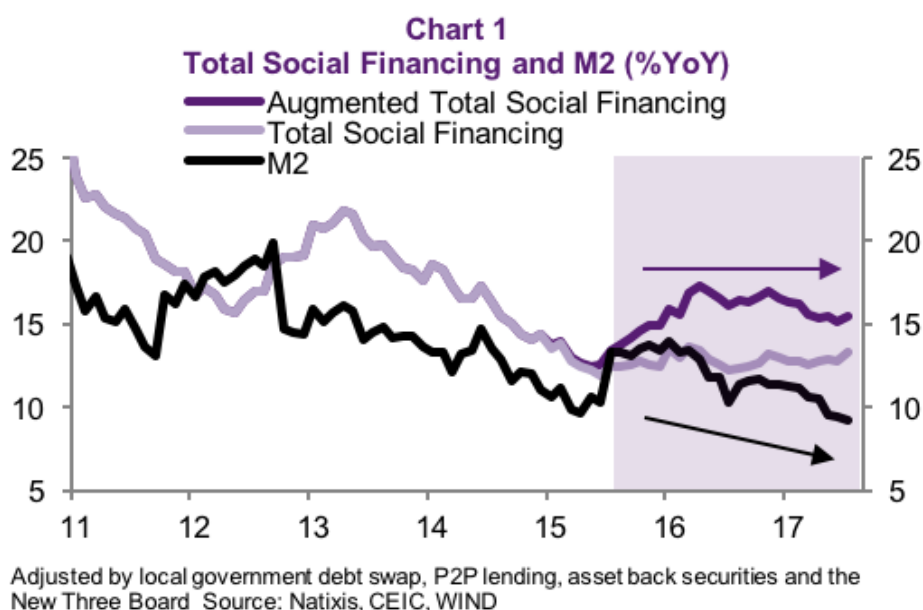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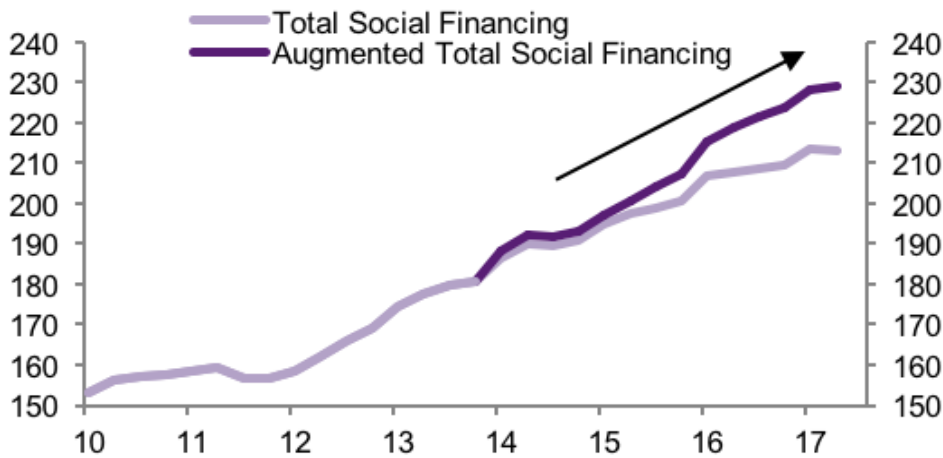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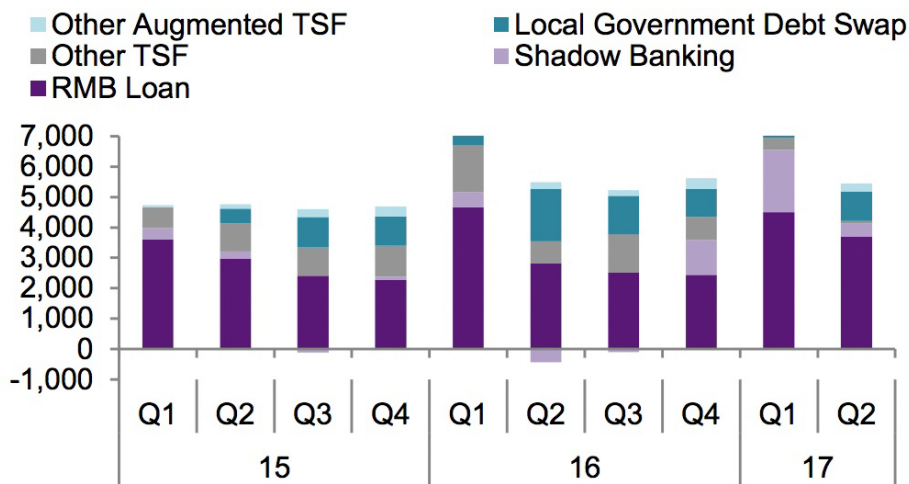


Chart 2
Total Social Financing (%GDP)



Adjusted by local government debt swap, P2P lending, asset back securities and the New Three Board Source: Natixis, CEIC, WIND

New Increased Total Social Financing (RMB bn)



Source: Natixis, WIND

唯一的利好消息是，杠杆进程似乎在减缓，但这个还受制于那些为监管套利而不断诞生的影子银行新型产品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这些新产品随时可能使新编制的社会融资规模过时。区别在于它体现了大量金融创新技能而非反复提及的杠杆效应。广义货币显然已经不再是全面的评估手段了。

总之，目前杠杆进程的减缓速度不足以停止中国过分沉溺于信贷的问题。而一些评估方式显示，不断增多的债转股减少了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这似乎给高负债行业带来了喘息的机会。尽管如此，此类计划的中期稳定性还是取决于行业的盈利能力修复状况。

中国若不接受较低但是更具有可持续性的真实增长率，很难真正进入去杠杆化进程。

www.brinknews.com

印度战略选择：中国及亚洲力量均势

Rajesh Rajagopalan

印度虽说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却仍只能在中国愈发显著的上升趋势的阴影之下进行改革。中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已开始影响到亚洲地缘政治平衡，且其影响力应该会继续增加。为在失衡局势中确保自身利益，印度必须决定采取何种应对措施，眼下有六种潜在战略选择，包括保持不结盟状态、两面下注策略、培养本国军事力量、发展区域伙伴关系、与中国联盟、与美国联盟。而相较之下，与美国进一步交好看起来是印度制约中国最好的选择。发展区域伙伴关系、培养本国军事力量这两个选择虽然本身不能制约中国，却是很好的补充。

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

在两国有领土争议的前提下，对于印度而言，过去的历史可能使它联想到中国可能扮演的军事威胁角色。虽然印度有可观的军事力量，但中国目前的军事实力已然高于印度，且中国拥有更充足的军费。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军事支出必将高于印度。

无论是像联合国这样已经存在的组织，还是亚投行这类中国建立的新兴机构，中国对于这些国际组织的影响力使中国有机会可以在这些多边论坛中制约印度的利益与目标，尤其当印度希望在这些组织的改革过程中寻求更大的国际话语权时。

过去的几十年中，印度一直主导着南亚地区局势，但中国与巴基斯坦的结盟以及与南亚其他国家深化关系的做法给印度在这一区域的地位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由于中国有能力提供资金资助并制约印度，印度很多邻国可能会利用一个大国对抗另一个大国，致使印度后院失火。

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中国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其影响力，这可能造成印度的损失。

印度潜在的应对政策

中国的实力、地缘优势以及政策已明显威胁到印度的安全与国际利益，因此无论是否与中国结盟都似乎无法满足印度的利益诉求。

考虑到美国是唯一一个强于中国的国家，印度进一步与美国交好，延续之前的政策才是印度应对中国崛起最好的选择。另外，印度与美国在制约中国这个问题上也有相同的利益诉求。

在制衡中国这个问题上，培养本国军事力量，建立区域伙伴关系这两个战略选择有其必要性，也可以起到辅助作用，但不能只依靠这两个战略。

因为中国已然比印度力量更强大、经济实力更雄厚，甚至强于超过任何其他亚洲国家的集合。

carnegieindia.org

印度外交政策中的地缘经济目的及莫迪政府

Péter Klemensits

2014年，纳兰德拉·莫迪上台后，印度开始实行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关注国家的地缘经济。过去三年中，印度政府在这方面获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地缘政治因素却阻碍了莫迪政府地缘经济战略的成功实施。

2014年，纳兰德拉·莫迪上台，成为新任印度总理。此后，印度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因为莫迪认为改革经济、促进发展是新时期外交关系的基础。为了实现他的地缘经济构想，过去三年中，莫迪发起了许多举措和项目，这一切都非常值得关注。莫迪政府任期已经过半，此时仔细研究莫迪政府的地缘经济战略、分析其成果及不足、探究地缘政治对其造成的影响是很有价值的。

外交政策和地缘经济

自1947年起，印度的外交政策就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全球的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并坚持不结盟。在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之交，外交政策中的经济考量继续加强，地缘经济利益成为焦点。

“地缘经济”包括促进跨国国家建设和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因而，印度致力于与其他国家建立伙伴关系，适应市场情况的同时，争取走上经济一体化的道路。与地缘政治目的不同，地缘政治战略关注的是国家的全球经济竞争力，而非政治同盟、领土扩张和国境防护问题。但是，没有明确的地缘政治战略，地缘经济构想是很难实现的，因此，政府需要努力将两者结合，并达到相互平衡。

莫迪的地缘经济目标

印度的外交政策并不是僵化的，尽管政府有时的确试图制定出明确的外交政治战略。但是，总体来说，印度外交政策中这种情况的只主导到2014年，这意味着政府方面也在努力适应国外进程。莫迪上台后改变了这种情况，相较于他的前任总理，莫迪在国际舞台中更加果断，如今没有人能否认他的成功。这并不是说曼莫汉·辛格政府在2004至2014年执政期间没有相似的构想，毕竟莫迪在许多方面都延续了自己前任的政策，只需要想想印度与美国、中国、伊朗的关系，海上安全问题和印度的非洲政策就能明白了。其实，莫迪的外交政策并不总是积极主动的，但是，他一步一步构建起了与地缘政治图景相一致的外交政策，下面就具体来说他的外交政策。莫迪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印度的经济转型，并巩固其新兴大国地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2014年9月，莫迪发起了“印度制造”计划，想要通



SAARC Member States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source: <http://www.mykidsway.com/images/saarc/saarc-map.jpg>)

过外国投资将该国转变为制造中心。此外，他也优先关注能源安全，基建发展和贸易扩张等问题。总体来说，地缘经济计划的实现主要取决于三大支柱：1. 对于正在兴起的印度来说，能够在南亚地区发挥主导作用是先决条件，这也体现在“邻国第一”政策中。2. 莫迪的另一个目标是巩固印度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合作，这也是“东向行动”政策的标志。3. 印度前所未有地重视海军力量，印度洋地区的发展也受到了关注。

“邻国第一”政策

莫迪认识到，要想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印度首先要在区域内发挥领导作用。这一进程中，最引人注目的举措是邀请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成员国在2014年5月参加印度总理就职典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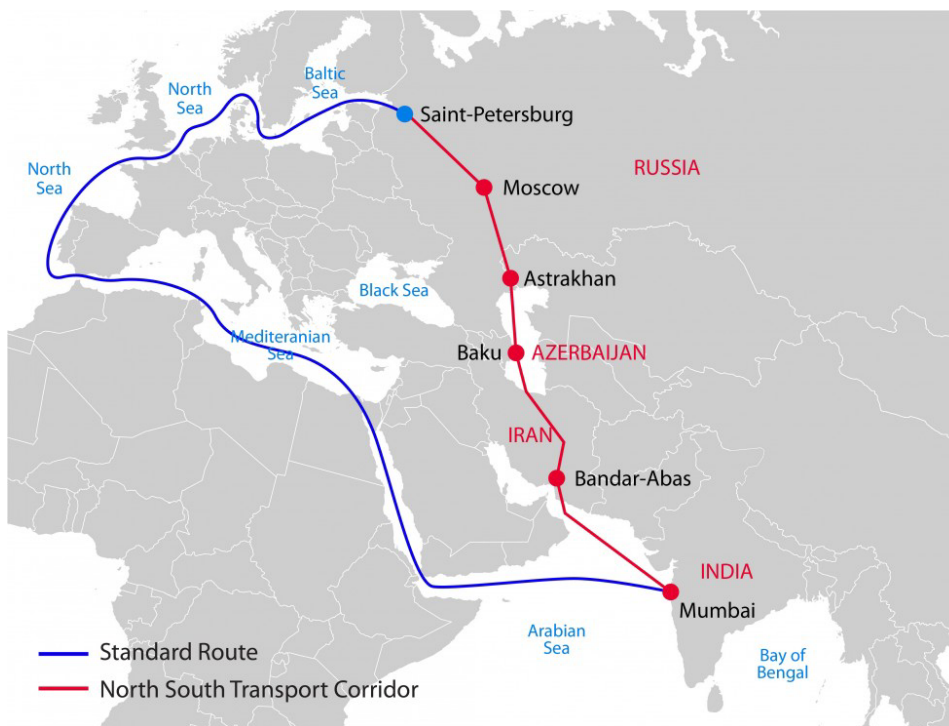
经过双边协商，5月5日，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将“南亚卫星”送入轨道，用来加强南亚国家之间的交流。该卫星同时也支持科学、经济合作，被无偿地提供给印度周边国家。这也是印度作为地区领导者身份的体现。除巴基斯坦外，印度邻国都积极响应了这一倡议。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也因此得到加强。

莫迪就职后多次访问邻国，最先访问的国家是不丹。在出访过程中，他努力巩固或恢复印度同各国的友好关系，并加强双方经济合作。莫迪政府的重要目标也包括在不丹、尼泊尔和孟加拉国增加印度投资，改善区域连通性。“孟(加拉国)不(丹)印(度)尼(泊尔)次区域合作”(BBIN)的职责包括发展贸易、建立南北直接交流渠道，2015年6月签订的“机动

车辆(通行)协议”在消除妨碍交通的因素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据此,机动车行驶将由到电子追踪系统监管,同时,机动车会获得进入成员国领土的电子许可,因而,只需要在到达目的地时进行清关,这大大减少了运货周期。印度政府拨出10多亿美元用于建设和开发连接孟加拉国,不丹和尼泊尔的公路网,总长度为558公里。其中50%的款项来自亚洲开发银行的资助,投资预计于2018年交付完成,这一计划预计将区域贸易额增加60%。

除了邻国之外,印度也努力与伊朗和阿富汗建立更密切的经济伙伴关系。由于在莫迪统治下,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印度方面开始试图孤立其西北邻国,并加强对伊斯兰堡的防御。2016年5月,伊朗、印度和阿富汗政府达成一致,允许印度商品通过伊朗进入阿富汗领土。这一过程中,恰巴哈尔港(the Port of ChabaBar)扮演了重要角色。恰巴哈尔港距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Port of Gwadar)仅有72公里,而坦瓜达尔港是中国“新丝绸之路”倡议的重要参与方。除了对现有港口的修复外,2016年5月,印度提出了加强港口建设的构想,希望其能够接待价值5亿美元的大型集装箱货轮。根据这一计划,恰巴哈尔港的接待能力将从每年250万吨跃升至每年800万吨。修建恰巴哈尔港-扎黑丹铁路是该项目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预计共将花费16亿美元,全部由印度政府支付。

伊朗在国际南北运输走廊(INSTC)项目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一



The North-South Transport Corridor 南北运输走廊

(source: <https://cdn.rbth.com/980x-/web/in-rbth/images/2016-11/top/north-south-transport-corridor.jpg>)

项目主要目标是通过中亚连接俄罗斯，伊朗和印度。莫迪在 2017 年 6 月访问莫斯科时，双方共同宣布他们计划在十年内将两国的商业成交额提高到 300 亿美元。印度方面称，国际南北运输走廊项目将使这一目标成为可能，因为它将使商业运输路线长度较目前缩短 40%，从而减少 30% 的成本。

如今，印度和俄罗斯之间建立了绿色通道，印度加入了国际陆路运输协定（TIR），这都有助于通关，而在未来，这一流程可以进一步简化。

“东向行动”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

纳拉辛哈·拉奥政府于 1991 年宣布了“东向行动”政策，后续政府一直在努力执行这一政策。其核心在于印度需要在战略和经济方面巩固与东南亚国家的伙伴关系，与不断崛起的中国达成地区平衡。2014 年 11 月，莫迪政府加强了与东盟国家实行更紧密合作承诺，并强调“东向行动”是要主动采取行动。

印度与缅甸的关系至关重要，这也对“邻国第一”政策进行了补充。在经济方面，缅甸相当于印度通往东南亚的大门。因此，印度政府想要从头开始，改善两国之间的连通性，因为缺乏良好的道路和铁路也大大阻碍了印度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因此，正在建设中的印度 - 缅甸 - 泰国三边高速公路将以“东西经济走廊”的名义，进一步延伸至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印度政府的另一个重要的举措是卡拉丹（Kaladan）项目，它将加尔各答（Kolkata）和实兑（Sittwe）从海上连接起来，再通过卡拉丹河连接实兑和腊戍（Lashio），最后通过公路连接腊戍和米佐拉姆邦（Mizoram）。

新加坡是印度最大的外国投资者之一，因此，经济合作一直主导两国关系。然而，2016 年，两国共同签署了协议建立“战略关系”，这为双方进行政治、国防、军事合作提供了更多机会。新加坡是第一个与印度签署“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的东盟国家。

至于越南，除了政治和国防合作外，印度也十分关注中国南海地区的碳氢资源。印度资本在越南市场扩张同样符合双方共同利益，双边贸易额不断增加，到 2020 年贸易总额可能将达到 150 亿美元。

印度对东亚国家的开放主要集中在韩国和日本。2015 年 5 月，莫迪访问首尔时，各方同意在特殊战略关系层面上继续发展合作，同时，确认了以前缔结的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内容。根据“印度制造”计划，两国政府还同意在 2017 年春季建造总价值达 20 亿美元的军舰。

2014 年，莫迪访问东京，进一步加强了印度与日本的合作。双方签署了“特别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协定”，经济关系开始复苏。日本计划在未来 5 年内向印度投资 350 亿美元，包括“智能城市”项目、“德里 - 孟买工业走廊”项目。2015 年 12 月，莫迪证实他计划在日本政府帮助下，运用新干线技术，在孟买与艾哈迈达之间架设高速铁路。

莫迪上任后表示要与中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商业和经济合作。2014 年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印度洋区域

(source: http://cdn.playbuzz.com/cdn/b3c18164-6347-46c1-9beb-2ef59571902b/46c9c572-4c95-4e34-9032-fe9eb1c1480b_560_420.jpg)

秋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印度进行了访问。除了减少贸易逆差外，印度方面也希望能吸引中国基础建设投资，因为中国方面正计划推进价值近1000亿美元的高速铁路等项目。

印度的海军力量

就经济层面来说，印度洋的国际重要性在一些方面是毋庸置疑的。它连接了战略性贸易航线，每年全球有64%的石油交易都发生在印度洋上，就是说每天都有3600万桶石油经过印度洋。此外，印度洋的海岸沿线居住着将近20亿居民，它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人们也不能忽视印度洋的自然资源：全世界在海岸线上提炼的石油中，有40%的都来自这一地区，15%的鱼都是从这里捕捞上来的。印度洋海下稀有矿物（锰，锌，铜，银，金）的开采对印度而言也尤为重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一直试图发挥区域领导作用，并且更加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但是只有莫迪认为地区关系是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2015年3月，印度内阁推出了与另外两个经济支柱相关的印度国家港口建设项目（Sagar Mala Project），旨在开发印度港口及海岸线，项目价值约1200亿美元。这个构想赶上了好时机：当时印度95%的贸易都是在海上进行的。国家港口建设项目总共有415个小项，包括12个港口和1208个岛屿的发展项目，同时计划建造6个大型港口。此外，滨海区域的工业化及基础设施建设也在这一计划中，预计2035年实现。

2016年1月，印度外交部下设印度洋区域部门，以促进印度与该地区

其他国家的合作，这也体现了印度的区域政策。斯里兰卡、毛里求斯、塞舌尔和马尔代夫都受到了很多关注。上一任斯里兰卡政府相较于印度，更注重和中国加强合作，然而，2015年新任斯里兰卡内阁开始对印度的计划表示热烈的欢迎。莫迪已经两次访问这个岛屿国家，与之签订了众多经济和安全协定，斯里兰卡也成为印度的关键盟友之一。在毛里求斯方面，两国国家元首相互进行了访问，印度主要巩固了海洋安全，并为毛里求斯发展提供了5亿美元的贷款。塞舌尔和马尔代夫也在这一阵营当中，在过去三年中，莫迪政府内阁不断加深与这些国家的联系。

印度发起的“季风计划”（Mausam Project）也强调各国间的紧密团结，旨在恢复该地区传统的文化关系，同时寻求与印度洋区域邻国间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印度继续支持人道主义和救灾领域的工作，尤其在斯里兰卡地区，这也印证了印度的国家软实力正在不断加强。

地缘政治因素

实现地缘经济目的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关注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这就是说，与其他国家保持恰当的和谐关系是印度成功的标志。一些观点认为莫迪内阁目前还未建立起清晰的地缘政治目标，在缺乏明确目标的前提下，他所提出的突出地缘经济目标的外交政策长期来看可能不会成功。

但毫无疑问的是，上述外交和经济政治工作并不总能和国家地缘政治利益相吻合，更何况，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因素会阻碍政府采取积极主动的政策。中国的外交政策较为激进，这对印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



Th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中国 - 巴基斯坦经济走廊
(source: <http://sosttoday.com/wp-content/uploads/2014/03/Gwadar-Kashgar-economic-corridor.jpg>)

为除了边界争端之外，中国政府为实现自己全球地缘经济目标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也让印度陷入了两难境地。印度政府依然想要接受中国政府对印度地区的基础建设投资，但这仅仅是从经济层面来说，因为出于地缘政治方面的考量，印度并不想参与中国政府提出的这个特大工程，尽管这样做可能会阻碍建立“孟加拉国 - 中国 - 印度 - 缅甸经济走廊”这一构想的实现。中国通过克什米尔地区建设的“中国 - 巴基斯坦经济走廊”同样也遭到了印度的反对，印度声称所有克什米尔地区，而该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则在巴基斯坦手中。

在莫迪政府执政期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矛盾持续升级，2016年事件发生后，两国一直处在战争的边缘，这对印度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害。因此，印度政府与伊朗和其他邻国合作，试图孤立巴基斯坦，并减少对于伊斯兰堡基础设施的依赖。然而，印度与伊朗的伙伴关系却岌岌可危，因为伊朗在未来很有可能会面临国际制裁，这同样会对印度带来不良影响。

印度与美国的关系近期有较大改善，然而，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美俄关系及美中关系的改变都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未来印度的地缘政治目标。

总而言之，可以说莫迪政府的外交政策及地缘经济战略在过去三年中取得了众多喜人的成效。但是，由于缺乏谨慎的平衡政策，长期看来，印度悬而未决的地缘政治问题有可能会逆转这一积极的进程。

翻译：李想

洞朗对峙事件的后续局势

Christophe Jaffrelot

中国和印度的洞朗对峙事件具有许多参考意义。第一，在第三方请求援助后，这是印度第一次在中国边界部署部队——甚至部署数百人。第二，虽然近期这种对峙越来越多，但这是耗时最长的一次——大概十周，这表明双方存在很大冲突，边界争端解决机制不如以前那么有效，甚至在此情况下毫不适用。第三，印度能够宣称，其已强迫中国撤出，这已让其他在中国压力下的南亚国家开始向印度求助，以保护主权。

不过，这种局势还与两方相关：不丹和中国。不丹向印度求助，尽管事实上，洞朗对不丹的战略意义，并没有对印度那么重要。印度领导人担忧“鸡颈”的安全，那里是一片容易被攻击的平原和山谷，是不丹的一部分（包括洞朗高原）。在这种情况下，不丹是否还和印度统一战线，这才是关键问题。中国将继续软硬兼施去控制中国游客已然大量到访的喜马拉雅高原。印度能作何反应？安全起见，可以动员军事力量。

但是经济发展呢？不丹人赞赏印度在文化与社会方面的软实力，但是占不丹国内生产总值 25-30% 的水电领域国家合作却不能让人满意。印度必须在这方面增加效力去保证获得不丹的信任。

这些问题将在 2018 年不丹大选中接受讨论。一些观察员已经强调，不丹不该疏远中国，冒险破坏双方对话。两国没有外交关系，但他们从 1984 年后就有所交流，并在 1998 年签署了“维护边界和平协定”。他们本该在 8 月前举行第 25 次边界争端谈判，但中国已经将此谈判无限期推迟了。

但是不丹的态度十分重要，中国的战略也很关键。在推土机 6 月中旬开始在洞朗和姐普（不丹在此有军营）建设公路后，中国已经解释说，洞朗“从古至今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声明始终存在。八月末，解放军撤退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于 9 月举行的金砖国家狐疑，要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印度的态度，如果纳伦德拉·莫迪不出席厦门的会议，习近平的国际形象会被严重影响。在中国共产党大会的前几周，这对他说来非常重要，这关系到他能否成功连任。

但中国可能会在洞朗卷土重来。在 8 月 28 日中国撤军时，理由是天气原因和“其他因素”。更重要的是，中国官方表明，解放军将继续在此地区巡逻。习近平连任后，将会重新审视他对解放军此前存在的“扩张主义”倾向的控制能力。但是即使他能够进一步维护自己的权力，从中国在阿鲁纳恰尔邦的领土声明，到其对反对印度进入核供应国集团，争端局势还是会存在。

当然，在厦门，习近平已经将巴基斯坦的伊斯兰组织命名为恐怖分子，包括 LeT、哈卡尼网络、TTP 和杰伊什·穆罕穆德。但中国可能会在联合国继续否决以杰伊什、阿兹哈尔为目标的类似举措。在一些情况下，中国将不会放弃巴基斯坦，而中巴经济走廊正在蓬勃发展，成为习近平“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方面，印度能做什么呢？它已经和美国走得越来越近了。但是这个策略还是存在问题，并不只是因为特朗普的古怪行为和保护主义者——甚至孤立主义者的政策，但也因为这种友善关系的建立将使其远离中国甚至俄罗斯。事实上，这些举措可能会首先影响到金砖成员国本身。关于洞朗和金砖组织，专栏作家萨米尔·萨兰提到，“这些事件清楚地表明，我们必须摆脱对金砖国家内思想融合的空想。每个成员都必须看清这个组织——二十一世纪的国家间具有‘有限目标合作伙伴关系’，并获得具体成果。印度对于金砖国家的怀疑态度将会增强，因为俄罗斯试图使用利用金砖组织反对西方，并不断‘默许中国领导’”，用萨兰的话说。

除了美国，印度也转向了日本。7月31日，纳伦德拉·莫迪发起了“亚非增长走廊”，一个由印度和日本共同构想的项目。安倍晋三在9月14日艾哈迈达巴德 - 孟买子弹头列车线开通时，可能会重申日本想要和印度建立雄心勃勃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个合作关系可能是一个更大联盟的基石，可能包括其他在亚太地区渴望抵制中国的“珍珠串”国家。

印度抵制中国可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经济：中国不仅是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有一半的手机在中国制造），而且也是一个重大投资者：中国企业家是非常中意“印度制造”。在目前的情况下，印度部长继续邀请他们，这样做的确实令人困惑。其次，印度不能像中国那样，调动资源在第三国家进军。斯里兰卡就是这样一个例子：7月，中国可以获得汉班托塔深海港口70%的资源，而在包括瓜达尔在内的许多其他战略地点，印度也不能与之竞争。

翻译：马健威

indianexpress.com

中国就恐怖主义向巴基斯坦施压？

Arushi Kumar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最近一次美国阿富汗战略修正的公告中对巴基斯坦进行了告诫。他说在对塔利班的战斗中，巴基斯坦藏匿了“每天都想要杀戮我们人民的组织”。然而有分析指出，鉴于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关系日益靠近，其是否真的有必要回应美国的要求并“展示其对文明，秩序和和平的承诺”。虽然中国第一时间站在了巴基斯坦一边，谴责了特朗普的评论，但2017年厦门金砖四国峰会的宣言却意义非凡。这是第一次中国同意声讨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组织，比如哈卡尼网络，虔诚军和默罕默德军，尽管去年其多次阻止联合国安理会把默罕默德军的领导者马苏德·阿兹哈尔列为全球认定的恐怖份子。

中国在关键时刻对巴基斯坦的外交支持阻止了可能对巴基斯坦经济政治产生不利影响的制裁。同时，印度在国际论坛上称中国的行为体现了“在与恐怖主义的斗争中的双重标准”的广泛存在。所以变化是什么？就是尽管在公开声明上支持巴基斯坦，但中国日益增加的经济风险和地区扩散的安全问题似乎正在迫使北京改变内部策略并加强对巴基斯坦安全问题的掌控。

中国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利益

中国在中巴经济走廊已经投资了620亿美元，这被视为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这个计划旨在通过贸易网络和交通走廊加强中国与欧洲中东的联系。中巴经济走廊计划通过基础设施现代化来支撑巴基斯坦经济，但中国十分担心恐怖主义对其投资造成的威胁。这也是为什么在计划中加入了安全问题，包括在主要城市设置实时和24小时监控设施，并在“主要道路，敏感地区和拥挤地带”放置爆炸探测器和扫描仪。

同时，中国也很担心在巴基斯坦境内的国民的安全。尽管有一个由9000名巴基斯坦军队士兵和6000名准军事部队士兵组成的特别安全部队来保护中巴经济走廊的工作人员，但六月在奎塔发生的一对中国夫妇被伊斯兰国家拥护者绑架杀害的事件充分说明了巴方无法有效保护中国公民。自2015年中巴经济走廊启动后，中国公民就一直在进入巴基斯坦境内，目前居住在巴基斯坦的中国人人数已经涨了三倍，达到了3万人左右，同时在2016年有71000名中国游客持短期签证来访。

中国在南亚的利益也包括阿富汗。中国已经加强了其在阿富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存在，并且关注着尚未被开发的价值1万亿美元矿物资源。

目前，由中冶集团和江西铜业集团组成的联合团体已经和阿富汗签订了 29 亿美元的协议，得以开采梅斯埃纳克的铜矿矿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开发矿藏之一，预计有着价值 880 亿美元的矿石。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也正在挖掘阿富汗的石油资源，每年从阿富汗北部的阿姆河盆地开采 150 万桶石油。

中国不仅因为经济利益要促进阿富汗的稳定，也有政治和安全考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阿富汗交界，在那里的政治异议分子可能会与一些比如来自东突组织的恐怖分子产生联系。东突组织一直寻求将中国西北部的维吾尔地区分裂出去从而独立。因此北京有理由要求伊斯兰堡打击把巴基斯坦当作避难所的恐怖组织。

金砖四国峰会后续：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反应

没有人可以低估 2017 金砖四国峰会宣言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去年的果阿峰会上，中国还阻止了印度把巴基斯坦列为恐怖主义的中心。在宣言发布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说：“我无法理解中国为什么会同意这份宣言……巴基斯坦一定会很不安。由于特朗普的谴责，巴方已经感受到了压力”。

尽管中国否认了政策会变化，并且外交部长王毅说在面对恐怖主义时“巴方认识清楚且做到了最好”，但很明显，来自厦门的这则信息还是触及了伊斯兰堡。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赫瓦贾·阿西夫拜访了中国，讨论峰会宣言和美国的新阿富汗政策。他承认到巴基斯坦应该限制虔诚军和默罕默德军等势力的活动以向国际社会展示巴方已经进行了内部整顿。

继特朗普公开表明巴基斯坦的避难所作用对北约在阿富汗的行动造成了挑战后，此次峰会宣言意义非凡。它标志着中国的立场已经从常年保护伊斯兰堡转变为了要制止巴基斯坦选择性与恐怖主义战斗的行为。中国会从中获益，这并不是出于无私的原因，而是该地区的不稳定会限制其投资的回报。目前中国对由美国维持的南亚的相对稳定满意并从中受益，但中国在这基础之上的进一步推动可能会在促使巴基斯坦放弃对恐怖主义的支持上产生关键作用。

翻译：任安道

southasianvoices.org

阿富汗反恐的地区参与的前景

S. Mahdi Munadi

俄罗斯与其他五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中国、伊朗、印度）进行的关于阿富汗和平与安全对话会议为阿富汗问题区域增添了新活力，而这种地区活力间接地促成了一个旨在挑战原先由美国主导的阿富汗秩序的新框架的出现。这似乎意味着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论断迟暮将近，而由新框架的形成而促成的新的历史进程即将展开。

伴随着阿富汗整体的局势和情况的转变，地区活力逐渐上升。这也改变了影响阿富汗境内战争的两个大因素。

首先，是极端分子所占领土区域分布和范围有所改变。在此之前，大部分极端分子分布于阿富汗的南部与东部，如今他们更多的存在于北部。在过去，这些极端势力并没有向中亚发展的趋势，然而现今，不论事实是否如此，这些极端势力被认为已经开始正在向中亚北部以及中国新疆东北部渗透发展。

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运动、塔吉克斯坦的伊斯兰复兴党激进分子、土耳其伊斯兰党以及中亚其他的和中国新疆的极端分子与伊斯兰国拥有共同的目标。由于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去伊斯兰化的政策促成了中亚国家伊斯兰政党内部反动势力的出现，而这种情况又增加了这些伊斯兰政党的极端活动同时也使它们与伊斯兰国紧密联系。因此，阿富汗的不安全区域的扩大以及文化上的适合性使阿富汗很容易被认为成沟通伊斯兰国的精神和实际桥梁纽带。综上所述，伊斯兰国可以利用这一（与阿富汗北部、中亚国家和中国新疆极端分子的联系的）这一机会将它的武器、武装力量、意识形态输送给（整个）区域的极端势力所在地，尤其是向中亚地区的费尔干纳谷地以及中国新疆的输送。

第二，是对美国在该区域反恐的角色的认知的变化。过去，区域内国家对美国的反恐角色信任有加，而现在，不仅仅是阿富汗人，区域内各个国家纷纷对美国失去信心。此前，区域内的国家，尤其是俄罗斯会与美国进行在阿富汗境内诸如禁毒方面的合作。但是现在，虽然俄罗斯以及其他域内国家仍然像此前一样担心美国的收缩撤退，但它们也想在地区反恐中充当积极角色以及涉入阿富汗问题。

也许事实就是如此，虽然美国摧毁了塔利班政权，改变了阿富汗人的命运，但是从对美国引导的秩序的评估以及阿富汗现状的综合考量来看，美国并没有以在阿富汗的体面的撤退来结束她的角色任务。

以上所提到的阿富汗国内战争的变化以及日趋上升的伊斯兰国的威胁使域内国家涉入反恐问题。域内新升的国家力量作为这一区域框架叙事的

新的国际行为体强化了阿富汗问题解决的两个新局面。

第一，是区域国家对解决塔利班、伊斯兰国以及其他极端势力集团的不同观点。俄罗斯、伊朗、巴基斯坦主张利用塔利班作为对抗叙事和集团以减少伊斯兰国的威胁范围的扩大。三国均在寻求通过不同层次的处理与的塔利班关系的方式缩小伊斯兰国的威胁范围。然而，他们仅仅宣称保持（与塔利班）的简单关系以保护他们的平民和使馆或促进和平对话，但是武装地区的地方分子报告了他们对塔利班的直接援助。正如我们所见，这些国家之间的一个间接的傀儡战争或情报竞赛正在阿富汗上演。（一般情况下，从区域国家的视野来看）中国政策往往被忽视，中国制定并开展经济导向型政策，但是中国政策的改革、中国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的联盟关系以及近期与俄罗斯在阿富汗问题上的会晤表明了中国在该地区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观察国的角色这一事实。为了保障中国的经济发展倡议，中国已然开始参与和塔利班以及其他区域国家的地区和平协商会议。塔利班是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以及受之影响的民族分裂主义的始作俑者，是无需再提的事实。任何向这些势力集团提供帮助的形式均意味着是对恐怖主义的帮助。就近关于塔利班的新闻显示，塔利班向超过 20 个武装集团提供避难场所。

第二，是新兴地区力量塑造区域国家与美国在阿富汗的地缘政治观念。美国将（区域国家的）区域活动视为对其自身在阿富汗地位的挑战。然而域内行为体考虑的是手段的合法性，这使他们能够用一切方式来保障（区域）安全是与国家利益。但是传统意义上作为缓冲国的阿富汗被认为是合作而非竞争的平台，但是区域行为体与美国的不信任的情况增加地缘政治认知。正因为如此，二战后的大国形成了理性主义认知，即因核武器威慑而永远不与对方进行直接战争，而只是在贫穷、分裂、失败国家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最糟糕的地区状况是，即阿富汗极有可能成为亚洲新兴力量与美国竞争的地缘政治舞台。毋庸置疑，随着这场竞争，上文提及的三股势力会因此而蓬勃发展且触动威胁经济倡议政策发展。

为了避免最差的情况出现，我们需要替换以新的局面。这样的替换是用区域合作取代区域竞争。合作的叙事框架能够应对极端势力集团，缩减恐怖主义威胁范围。对恐怖主义的胜利能够保障我们的经济倡议发展。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巴经济走廊、恰巴哈尔港以及土耳其和哈萨克斯坦的地区倡议及其他有助于了“亚洲崛起”的概念（的形成）。法里德·扎卡利亚在他的题为《后美国世界》一书中讨论了例如中国、印度、巴西等国的“他者的崛起”。“他者”或是新兴国家由于经济增长造就了新的全球景观，在这一景观中，新兴经济体改变和产生了政治自信和民族自豪感。（而）如果区域国家保持竞争态势或寻求他们自身对于反恐的观点（与做法）会导致他们错过上述的崛起态势。

一方面以寻求经济倡议稳定（环境），一方面以共享经济倡议利益为

目标的阿富汗、南亚与中亚的反恐行动有助于所有（相关）国家与对方的合作。中国需要在发展中巴经济走廊倡议中促进与印度的合作，并且说服印度参与其重要倡议（“一带一路”）。促进美国公司在新丝绸之路概念框架下参与激活经济倡议。当重要的中美关系分析专家亨利·A·基辛格在“中国论坛”50周年回应问题——“美国与中国未利用的合作来源是什么”时，他提到在中亚的“一带一路”倡议合作以及阿富汗作为中国的邻国是所有国家之间合作的重要机遇，这两个未利用的开发合作关系的来源应该能够解决地区威胁以及促进地区合作。

尽管中美在南海问题上存在竞争，创造区域合作对两国都是有利的。在国际关系中，超级大国同时执行两个对立的政策是可以接受的，他们（可以）在一个区域竞争，但在另一个区域合作。

区域的变革和权力转移并不一定会促使对最差状态充分的系统评估，它其中仍然蕴含着合作型状况的机会的出现。

回顾历史，中国与美国曾经联手进行合作性的培训项目以及援助阿富汗，诸如2012年到2016年的中美对阿富汗外交官培训项目。目前也有新的美国与阿富汗的联合培训项目，例如医疗人员、农业技术培训。伊斯坦布尔进程框架下重要的合作内容“建立信任措施合作”能够为区域内国际合作提供主要平台。中美在这些方面的合作意味着双方可以增加他们在诸如军事训练与军备供给等其他方面的合作，这些方面的合作进而能够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亚地区的合作。

在历史上阿富汗的强政府曾帮助维护英国与俄罗斯在该地区的稳定。支持阿富汗政府有助于维持地区稳定。（目前）阿富汗弱政府使恐怖主义得以强化，并且随之而来的是域外势力对阿富汗的区域介入，这些因素正是造成叙利亚问题的原因。因此，维护阿富汗稳定，避免使之成为另一个叙利亚的唯一方式就是维持阿富汗独立行事的能力以及保障阿富汗以此为基础获得域外行为体参与阿富汗反恐战斗的能力。

《中国观》2017年长期征稿启事

为更好地落实新型智库建设，推动科学研究与决策咨询的相互转化，提供更多高质量、高水平的咨询报告与专家建议，复旦发展研究院和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拟就《中国观》向国内外学者长期征稿。《中国观》以中国当下各领域的热点议题为关注重点，每月月刊以“国际视角 前沿观点 中国智库 建言发展”为主题，选编国外顶尖智库最新中国研究成果，并且收录复旦发展研究院访问学者、国内智库专家对当前中国热点问题的政策分析。

一、征稿要求

1、政策分析或建议，对前瞻性、综合性问题有深度思考，选题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内政、外交、经济、社会、教育等与中国发展密切相关的领域。

2、英文版：可推荐国外智库或主流媒体发表的英文稿件（如为其他种类语言，请附上200字左右文章概述），亦可投送本人英文研究成果，经编辑部确定用稿后，由荐稿单位或个人组织翻译，或由编辑部统一翻译。

3、中文版：（1）各单位或个人可向编辑部投送稿件，选题自拟，语言精练、平实，避免学术化，字数3000字左右，文末附100字以内的作者简介；（2）如稿件涉及重大敏感问题，请勿用电子邮件直接发送，将文稿刻录光盘同纸质文本一并寄送至编辑部。

二、投稿须知

1、投稿邮箱为：thinktank@fudan.edu.cn，投稿时邮件主题处填写稿件标题，在文末附上以下内容（个人信息十分重要，要求准确无误）：文章标题、作者姓名、荐稿人姓名（或单位名称）、邮寄联系方式、电子邮件、电话号码。

2、一次一稿，请勿一次多稿或重复投稿。

3、允许稿件向其他刊物或渠道投送，录用意见一月内给出。一旦录用，编辑部会给予适当奖励。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黄昊，王柯力

联系电话：021-55665596

电子邮件：thinktank@fudan.edu.cn

寄送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智库楼211室

邮编：200433



复旦发展研究院

复旦发展研究院成立于1993年2月12日，对外立足于一流智库的建设，为国家和上海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复旦的思想与智慧，成为国家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对内立足于学科的交叉与整合，研究团队的建设与发展，以国家需求推动学科整合，以学科整合贡献国家发展，提升复旦大学在国家建设与进步中的地位与影响。复旦发展研究院所孵化和培育的研究机构包括7个国内中心，即：金融研究中心、金砖国家研究中心、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传播与国家治理中心、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社会科学数据研究中心、中国保险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3个海外中心，包括：复旦-UC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复旦-欧洲中国研究中心（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复旦-墨西哥中心（墨西哥蒙特雷技术大学）；1个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家俱乐部，2个大型论坛秘书处，分别为中国大学智库论坛秘书处与上海论坛组委会秘书处。



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

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在上海市教委领导下，依托复旦大学，致力于培育和提升上海高校智库建设的能力和水平，构建国内有地位、国际有影响的上海高校智库体系，以服务出管理、以内部交流出整合、以国际对话出影响、以评估出质量、以贡献出地位，搭建立足上海、服务全国和放眼世界的交流平台、推介平台和国际对话平台。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聚合上海高校的学术和智库资源，转化智库研究成果，为国家和政府建言献策；通过媒体向大众推介智库思想，实现学术成果的社会价值；培育有咨政能力的复合型优秀学者，推动高校学科建设，促进新型特色高校智库发展。

中国的角度

世界的维度

专业的深度

战略的高度

一般性声明：

* 本刊仅供本刊编辑部呈送的特定对象阅读使用，不做任何商业用途。

* 除明确提示的文章外，本刊其他文章基于已公开信息编译或选摘，但本刊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

* 本刊所编译、选摘的文章，仅如实、客观反映原作者观点和立场，并不代表本刊编辑部的观点和立场。

* 本刊属于内部资料，本刊编辑部对其保留一切权利。除非本刊编辑部事先书面授权，本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成任何形式的拷贝、复印件或复制品，或分发给特定阅读对象以外的人。

General Statement:

* This publication is provided by the editorial team for use by specially designated persons only. It is not for sale or redistribution.

* Unless otherwise noted, this publication's content is compiled, translated and edited from publicly available information. It does not guarantee the accuracy or completeness of said materials.

* Views expressed in the articles here are the original authors' own and do not represent the views of the editorial team.

* Material on these pages is for internal reference only. The editorial team reserves all rights. No portion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copied, altered in any way or transmitted to others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editorial team.